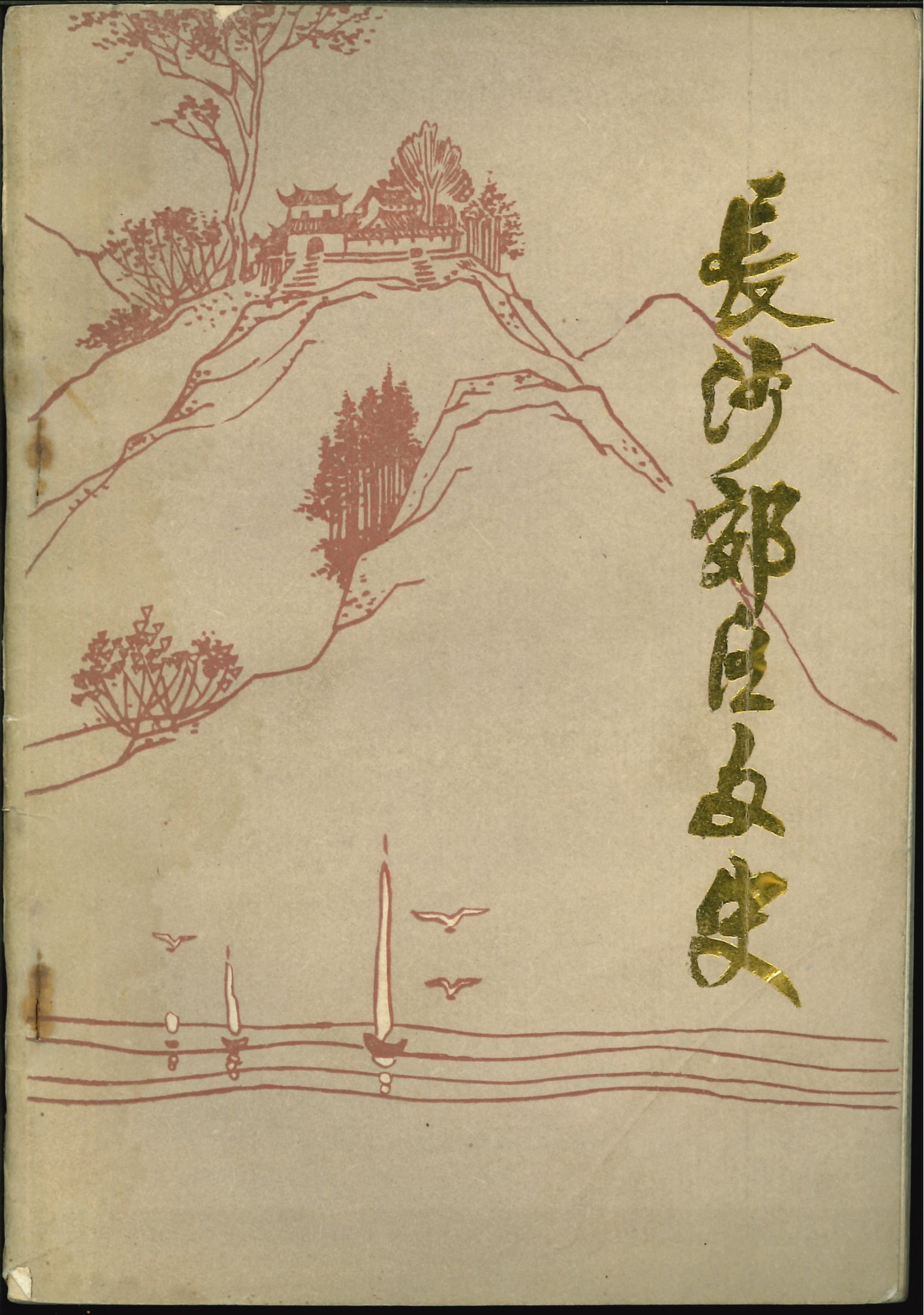

长沙郡县史

# 长沙郊区文史

##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长沙市郊区政协主席　王致和

在中共长沙市郊区区委的关怀和支持下，由市郊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长沙郊区文史》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了。它的创刊，标志着我郊文史资料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1985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愿藉此作为新年的献礼。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地人民政协组织的建立，这一工作已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时期。《长沙郊区文史》在这新的历史时期诞生，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是我们文史工作的方向；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文史工作的准则。我们一定广征博采史料，精选慎用文稿，竭尽全力把这刊物办好，使它能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参考资料；为发展统一战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我郊地处湖南省会长沙的周围，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近百年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我郊经历

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涌现了众多的重要人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长沙郊区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勤劳进取，顽强拚搏，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全郊人民的荣誉和骄傲。广泛地把这些史料迅速征集起来，并在这一基础上认真进行整理、编辑和出版，传之后代，是我郊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热望了解我郊史料的政协委员、干部、群众和在外地工作的市郊籍人士，以及曾在我郊工作过的党内外同志，都来关心这项工作，与我们积极合作。或惠赐宏文，或提供史料，或寄送文物，或晓示线索，俾能使我郊的文史资料工作得以更进一步开展，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4年12月



# 目　录

英烈传略



乡土风情





# 长沙郊区区划概况

长沙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根据有关史料查证：远在西汉初期即有夯土板筑城墙。明、清时，城墙已改为砖石所垒，上下完固，四周开设了城门九处。民国初年，新开经武门、学宫门、太平门、福星门，并原设的东门（小吴门）、东兴门（浏阳门）、南门（黄道门）、小西门（德润门）、大西门（驿步门）、草潮门（潮宗门）、通泰门（通货门）北门（湘春门）、兴汉门（新开门），共有城门十三处。城门以外一带便是郊区，由长沙、善化两县分辖。民国五年（1916年）议拆城垣修筑环城马路。民国十三年（1924年）分段兴工，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底竣工。此马路自北门河岸沿旧城基经北门、兴汉门、经武门、小吴门、浏阳门绕天心阁至西湖桥河岸止。马路以外的长沙县境属现郊区，为长沙县府所辖。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市分治，长沙市为省直辖市。次年，划定四边界限：北起落刀咀，沿浏阳河经湖迹渡、五里牌、杨家山、阿弥岭、石马铺、新开铺、百家河，对江从渔湾市沿岳麓山麓，经廖家垸子、小望城坡、石岭坳、竹山口、黄花港、双塘坳至银盆岭止，与落刀咀隔江相对。中心为市，市边属郊。其东、西、南、北四郊分由文艺、岳麓、金盆、会春四个区公所管辖。以上是长沙郊区建国前区划的大体情况。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后，郊区才正式建制，由长沙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建国以来，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郊区区划迭有变更，范围日益扩大。现辖九乡（东岸、黎托、大托、洞井、雨花亭、马王堆、福安、岳麓山、望岳）；五个国营农场（东方红、东屯渡、综合、畜牧、园艺）；五个国社渔场（湘湖、红色、黎明、西湖、岳麓）。其四境东、南、北三面与长沙县接壤，西面与望城县毗邻。湘江由南而北纵贯于中部，把全境分为河东、河西两个部分。她位处东经112°50′—113°04′、北纬28°03′—28°16′之间，总面积有295平方公里。这便是现在郊区区划的概况。

（编者）

# 建国前长沙郊区经济概况

罗立德

郊区环绕长沙城区四周，原属长沙县。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分设长沙、善化两县，郊区便分属两县管辖。辛亥革命后，将善化县并入长沙两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成立长沙市政府，次年划定市政府四郊管辖界：东抵五里牌、杨家山；南达石马铺、新开铺；西从渔湾市沿岳麓山麓，经竹山口抵银盆岭；北至落刀嘴隔江与银盆岭相对。随着郊区商品生产发展和长沙市场繁荣活跃，郊区范围日益扩大。

湘江从南到北纵贯，将郊区自然分为东、西两部。河东依偎浏阳河，蜿蜒注入湘江，汇合捞刀河，属河谷冲积平



原；河西沿岳麓山麓逶迤北去，有靳江河、龙王港流注，山峦起伏，属低山丘陵地貌。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富。

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中，郊区以稻谷为主的种植业便很发达，柑桔、茶叶是长沙郊区早期两大特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中，便有“湘水又北径南津城西，西对桔洲”的记载。唐代李德裕写的《瑞桔赋》中，便有“贞枝凝，蔚湘岸之夕阳”的赞美之词。从岳麓山前后至三汊矶一带，桔树成荫，青翠喜人。唐、宋以来，郊区便盛产茶叶。郊区农户利用山坡、屋傍，经营小块茶园，称河西园茶。茶叶条索紧细园曲，银毫显露，汤色澄黄鲜亮，清香爽口，尤以“清明前茶”、“谷雨前茶”品质更佳。河西园茶不只早已驰名长沙、武汉市场，而且远销香港、澳门等地，成为长沙地区著名特产。蔬菜种植历史也很悠久。清光绪三年（1877年）《善化县志》便载有叶、瓜、豆、根茎、香辛等类蔬菜四十三个品种，民国年间发展到七十多个品种。当时东山辣椒、史家坡萝卜，便已载誉长沙市场。民国年间。郊区有菜农四千余户，种植业促进了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清咸丰年间，河西咸嘉湖一带开始以豆类（绿豆、蚕豆、豌豆）作原料，制作粉丝，号称西粉，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西粉细如丝，白如银，雅名龙须细粉或银丝细粉。由于它烹调简便，营养丰富，凉拌炒烩，荤素咸宜，故畅销国内外。人们又统称它湘粉。制粉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畜牧业生产。河西粉坊都利用制粉豆渣饲养成批牲猪，粉坊、猪场得以同步发展。谚称“做粉不死猪，赛过当尚书”，可见收入之丰厚。养猪业又有利于发展种植业。如此综合利

用，循环促进，郊区商品生产不断发展，成为长沙市场的重要支柱之一。此外，郊区农户还有以种花为业的。民国年间，长沙市有紫香、汉兴、天宝、艺芳等花圃十四家，花源赖郊区供应。至于江河捕捞，渔业资源，郊区历来也很丰富。

郊区贴邻城市，地域宽广，早就成为长沙工业发展的基地。长沙近代工业始于清末维新变法期间。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湘善记和丰公司（后名和丰火柴厂，又名洋火局）建厂于北门外，生产双狮（红头）、龙牌（黑头）等十多种火柴，日产火柴二十多箱；民国年间改产三友、金钱、火车等牌，于是长沙开始有自产的火柴供应。光绪二十二年，粤商黄某创办大成公司于南门外灵官渡，开我省炼锑业的先河。同年，宝成制造公司开设于南门外，为长沙首办机器制造业和发电工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黑铅炼厂开设于南门外六铺街，宣统二年四月（1910年5月）开工炼铅，日炼矿砂五十吨。民国元年（1912年）经华纺纱公司成立，民国六年（1917年）改名华实纱厂，后名湖南第一纺纱厂，厂址设河西银盆岭。当时有纱绽四万，职工二千余人，日产棉纱近百包。同年官商合办华丰纸厂，开设于南门外。1933年改组为湖南造纸公司，次年开工，日产新闻纸、丁贡纸、连史纸、毛边纸共约六十令，为长沙机器造纸之始。1928年民生工厂开办，1932年改名湖南机械厂，设南门外六铺街，为当时全省唯一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1934年设在河西三汊矶的湖南炼锌厂开工，日炼毛砂三百吨。能产纯锌七百担，为当时国内用新法炼锌的唯一工厂。此外，还有散布在南门外仰天湖、冬瓜山一带的制革厂和玻璃厂。这些工



厂的建立，改变了当时长沙郊区的经济结构，促进了郊区商品生产，对长沙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秦、汉以来，长沙为历代郡、国、州、路、府的首县。旧时城东的小吴门、浏阳门，城南的黄道门，城西的德润（小西）门、驿步（大西）门，为所辖各县人员、商品进入长沙城垣必经之道，因而这几处城门口均为闹市。民国以前这些城门之外均属郊区，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已相当繁盛。著名商品有：小吴门的穿眼饼，鲇鱼套的水絮，南门口的结麻花，北门吊桥的豆腐；著名街市有校厂坪的煤栈，西湖路的皮坊。至于沿江一带，早为商市集散之所。唐代诗人杜甫晚年流寓长沙，便有“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的诗句。河西溁湾镇，因系宁乡、安化、益阳等地来长沙时渡江汇集之处，且有湘江水运之便，糟坊、染坊、粮食行、枯饼行、饮食店、百货店、南杂店一应俱全，蔚然成镇。较远处的望城坡，设有饭铺、客栈、茶铺、饮食店、供往来旅客住宿憩息。此外，南杂店、屠坊、理发店、手工织布、油鞋、木屐铺，生意也很兴隆。抗日战争期间，凭借湘江天堑，望城坡为城市难民聚集之地，人口陡增，店铺林立，商业鼎盛，成为与靖港，乔口，湘潭、宁乡、益阳等地商品交流集散之地。河东东山镇，依傍浏阳河，为长沙通往浏阳、平江、醴陵等县古道，离长沙城区约三十华里，水陆交通便利。镇上有客栈、饭铺、南杂店、肉店、理发店和园木店等。明、清以来，便是长沙城郊的著名市镇。郊区商业的形成发展，对长沙市场的繁荣，起着相互补充和促进作用。

然而，在长期封建剥削和殖民主义、官僚资本的残酷掠夺下，天灾人祸，连绵不绝。郊区虽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

# 长沙郊区湘粉生产概况

丁琦　沈其威

我郊的特产——湘粉，是人民群众喜爱的副食品。它色白如银，根条匀细，吸鲜力强，柔软爽滑；炒烩凉拌，荤素皆宜，价格低廉，为北菜涮锅、西菜三丝火锅不可缺少的原料，有“河西鱼翅”的美称。

湘粉生产起源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据传，制粉技术由湘潭传入我区，在西郊沿江一带设坊生产，并逐渐扎根向纵深发展。清光绪初年（1875年），粉丝作坊有：邓同兴、彭万兴、杨义和、张泰和、刘万达、雷升泰、龚伯高等七家，做粉时仍需请教湘潭技师。每坊月产干粉丝千余斤，根条粗如麦秸，色泽微黄。用稻草捆紧成把，在市区大西门、义码头一带摆摊设点，自产自销。虽质量不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颇受欢迎。由于产于河西，故称为西粉。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长沙、善化已有粉坊四十余家。因作坊增多，产销两旺，摆摊设点、自产自销已不符合形势要求。未售完的粉丝要宽屋寄存，人要入铺店投宿，诸多不便，故要求产销之间有所分工。经同业中部分业主倡议，成立“协和粉栈”，在大西门四十二号塔棚经营粉丝运销业务。该栈成立后，粉丝销路更广，对促进粉丝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光绪三十三年到民国初年，虽政局动荡，但河西粉丝

---

勤劳质朴、富有生产经验的广大人民，商品生产终未得到长足发展。这就是建国前长沙郊区经济的概况。

（本文作者系《长沙市场大观》编写组成员）



作坊仍发展迅速，由四十多家发展到一百余家。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政府登记在案的粉坊增达二百余家。1933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长沙处于繁荣时期，粉丝销路更广。业主也增强了资本，改善了经营管理，粉丝质量也有所提高。销售业务进入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为区别于北方粉丝，故俗称为“南粉”，市场遂统称为“湘粉”，冠以省名，以示区别，代替了“西粉”、“南粉”的旧名。

抗战初期，中原沦陷，交通阻塞，北方粉丝断绝，本地粉丝需供量激增，这对长沙粉丝生产大为有利。粉丝作坊增到八百五十二家，其中岳麓、望岳、东方红农场已达五百家。分布面积达百多平方公里，从业人口近十万余人。

1944年，长沙沦陷，湘粉业遭到很大摧残，千余家粉坊陷入绝境。仓空磨停，损失惨重。据1946年湖南省银行的调查报告，损失法币五十亿元左右（折合银元五百万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受内战影响，北方粉丝南下受阻，各地需求粉丝量大，故湘粉生产恢复迅速。到1946年秋，西郊湘粉作坊又恢复到两百来家，年产粉丝五十万斤左右。到1949年，郊区已达二百五十二家，年产量达百万斤，以运销两广为主。有名的作坊有李茂禧、王尚忠、王菊宗、彭长生等几家。全部粉坊固定资产约计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之谱。

建国后，地富经营的粉坊，均已垮台。为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解决资金困难，利用原有的设备，组织生产互助（合作化后称为粉丝生产组）由土产公司提供原料，生产组只收加工费和渣浆下脚，以粉换豆，另给加工费。公司用此办法，鼓励农民自营粉坊。

1954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个体经济性质的粉坊和为之服务的同业公会及湘粉联营购销处（包括协和粉栈）均一一撤销。合作性质的粉坊生产组业务归食杂公司主管。由于省、市二级公司的重视，1956—1957年分别组织技术人员到山东龙口学习，又请来十六名技师在东郊新成立的火炬粉厂传授龙口的“快缸”技术，并结合长沙的特点加以改进，形成了具有长沙特色的“中缸”操作工艺。出粉率大大提高了，由解放初期三担老庠蚕豆出干粉丝一百斤，逐步发展到三百斤蚕豆出干粉丝一百斤，而又省工、省力、安全。粉丝质量在根条、色泽、拉力等方面都接近青岛龙口粉丝的水平，产量也提高到年产百余万斤。

建国以来，省内许多地方从事粉丝生产，虽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但由于缺乏长沙地区的水质和历史上的市场优势以及技术上的优势，生产的质量均不能与长郊、望城两地抗衡。

（本文作者丁琦系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干部、沈其威是郊区政协委员）

# 长沙郊区柑桔生产概况

刘敬业

## 种植柑桔的历史和品种

我郊柑桔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清雍正年间《长沙县志·风土卷四》记载：“……桔洲昔传上多美桔，夏月水泛唯桔洲不没”。又据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柑桔子实枝条残体以



及刻有“桔一笥”的竹简，说明我郊种柑历史已有二千一百年之久。另据湖南省农科所1956年柑桔地方品种调查，我郊栽种南桔品种也有三百多年历史。据群众传言品种的来源，系福桔的实生变异，略似浙江早红。

柑桔属芸香科、柑桔亚科。柑桔亚科又分为三类。1.原始柑桔类，2.近似柑桔类，3.真正柑桔类。我郊生产利用只三个属（枳、柑桔、金柑）。岳麓山沿河南向是我郊产桔重点区，主要栽培的是宽皮桔类，其次是金柑、橙、柚类等，以朱红桔与黄皮桔栽培的历史较久。后来演变为南桔。本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南桔终于成为我郊主要栽培品种，故以麓山南桔盛名，远销港澳，驰名中外。它的特点是早熟、皮薄，果肉脆嫩无渣，味道浓甜，色泽美观，果形整齐。缺点为大小年显著，核多，不耐贮藏。另外，甜橙品种大致是二百多年前引进，时间比南桔迟，较难栽培。

1925年，我省园艺界老前辈刘宝书先生任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时，在日本国立鹿儿岛高等农林专科学校工作的黄绍棠先生，应邀回国在该校任教。他带回温州蜜柑（宫川、尾张、池田、龟井等品种），在我北郊铁佛东街甲农农场栽植（另一部分栽植在邵东县范家山刘家湾适园农场），是我省引进温州蜜柑最早的人。不几年，湖南省立高农学校迁至岳麓山左家垅，将温州蜜柑移栽到当地农场定植。之后，湖南省立第一农事试验场园艺科长罗贻华先生（系留日学生），又将温州蜜柑引进定植在南郊东塘试验场。同时，刘宝书与陈熹（园艺专家，原北京农大学生、当时任广雅中学校长）两先生在北郊丝茅冲创办湖南开源苗木公司，大量繁殖温州蜜柑苗木，向省内外推广。现我省柑桔品种主要为

温州蜜柑，我郊算是一个发源地。

久负盛名的柑桔产区岳麓山乡，品种有枳壳、月月桔、园金柑、佛手、普通酸橙、狗头柑、代代(春不老)、普通甜橙、扁园柚、沙田柚、普通黄皮桔、长沙南桔、长沙川桔、长沙梅柑、长沙糖桔、南丰蜜桔，椪柑、宫川温州蜜柑、尾张早生温州蜜柑、普通尾张温州蜜柑，池田温州蜜柑 等。品种繁多，风味各具。

## 气候、土壤对柑桔的影响

我国柑桔生产地区大致分布在北纬16°—37°之间。我郊位于北纬28°12′，东经112°47′，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夏温差25℃左右。据长沙气象站1932年至1953年统计资料，年平均气温为13.3℃，年平均雨日154.9日，年平均雨量1467.4毫米，绝对最低气温为—8.1℃。1948年、1954年出现两次大冻，气温曾至—9.4℃。因此，长沙地区较耐寒的红桔类及温州蜜柑类生长良好，而甜橙则容易遭受冻害，损失严重。如岳麓山乡的146株甜橙中，经1954年大冻后，仅残存13株，冻坏率达89%。1964年平均蒸发量为1634.7毫米，而七、八两月蒸发量约占全年的30%，出现严重的秋旱；又1966年8月26日至9月29日，日最大降水量为192.5毫米。大冻、高温、渍水等自然灾害，曾对我郊柑桔生产影响甚大，故适宜种植宽皮桔类品种。

柑桔适宜土层深厚、质地肥沃、排水良好、微酸性土壤(PH5.5—6.5)。岳麓山乡的土壤可分为红、黄壤土、板页岩风化土、花岗岩风化土、紫色页岩风化土、河流沉积土等。天马村的赵州港、桃花村的仙人凹，望麓桥村的石佳冲等地，土质良好。这些地方生产的柑桔着色好、糖分高，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 建国后柑桔的生产状况

建国前，我郊种植柑桔以河西最为普遍。单岳麓山乡一地，种植面积即有三千一百多亩，年产柑桔约七万一千担。建国后的四、五年，该乡种桔面积没有减少，但产量却逐年下降，直至减半。其原因甚多。主要的是“油它”问题，历年得不到解决；1953年红蜘蛛严重为害，使桔叶全脱，结实困难；1954年的大冻，因而产量连年大减。1953年春，我郊设立农业技术推广站，总结桔农经验，推行新的科学技术。在红蜘蛛为害期间，又派出技术人员组织桔农进行药械防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此，桔农学会使用药械来防治病虫害。

1956年长沙市人委郊区办事处农林科与省农科所园艺系结合在岳麓区进行柑桔地方品种整理，选出长沙梅柑为优良品种。其优点是耐贮藏（可至次年三、四月），愈久愈甜。对南桔高接换种也同时作了推广，为桔农树立科学种桔的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城市建设逐年扩大，近郊种桔面积随之缩小。1956年岳麓山乡种桔面积只有2719亩，又因大冻后桔树元气难以恢复和栽培管理不善，年产南桔仅7900担。1957年省林业厅无偿贷款两万多元给岳麓区，购买温州蜜柑苗木种植。1960年以后，郊区以岳麓山乡为中心，并在所属许多地区如综合、东方红、园艺、畜牧等农场和大托、洞井、黎托、望岳、雨花亭等乡积极扩种温州蜜柑，老桔区的南桔园也大多被温州蜜柑所取代。因此，我区南桔已逐年衰落，而温州蜜柑却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郊区岳麓山乡退休干部）

# 父亲在识字岭英勇就义

湖南省冶金工业局　　舒新恺

我父亲舒玉林，1902年出生，1922年参加革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长沙、新化发动工运，并担任过石门县委书记和湘西特委书记。

由于父亲长年在外从事党的地下活动，需要母亲（林芝芬）伴随掩护，我从小就寄养在长沙乡下外祖母家。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革命党人，母亲于1928年6月无辜关进了常德监狱。后因叛徒告密，7月，父亲在长沙被捕，关在陆军监狱。狱中三月，他受尽各种酷刑，从未吐露党的半点机密。敌人无奈，决定把他处杀。

11月6日（农历十月廿五日）早饭后，父亲最后一次从陆军监狱提讯到省督军署（现中山西路，老照壁斜对面）。上午九、十时许，受审完了正被绳捆索绑时，他猛力将缚绳的敌兵打翻，上前夺枪，准备作最后的拚搏。敌兵发出警哨，蜂拥而上，一阵枪托，父亲寡不敌众，终于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敌兵只得架着他押赴刑场。他一出督军署大门，就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经老照壁街口，他更是奋力高呼口号，不慎被街上一块麻石绊倒。敌兵又把他从地上拖起来架走，他仍是口号不断。敌兵恼羞成怒，用刺刀穿过他的双颊，把刺刀横闩在他口中，舌头差点全被截断，半节吊在嘴外，鲜血直流，白布褂子染成了红色。舌头刺伤后，他的呼声不很清楚，人们还可辨出是在喊



着："共产党万岁！万岁！"……

经过这些折腾，他已不省人事。敌兵前呼后拥架着他，后面跟着一群怒形如色的群众。

刽子手们把父亲拖到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这一带，当时是白骨垒垒的乱葬岗，一片荒芜，凄凉可怖。），即朝着后脑连发七枪，父亲的头部只剩下了下半部，身子倒在荒地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在场的群众无不潸然泪下。父亲牺牲后，当时不准收殓，嗣后，我的两个叔爹舒福生、舒元生，偷偷地把他的遗体抬到乡下，安埋在长沙县高沙坪舒家湾金鸡坡的山麓。

父亲牺牲后，由三舅林立夫出面，花了不少钱，找了些人"活动"，才把过了半年多铁窗生活的妈妈保释出来。那时我还不到三岁。父亲在识字岭英勇就义的这些情况，都是母亲生前和父亲友好告诉我的。

## 附：你可知道哪些烈士牺牲在识字岭？

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人民，在长沙古城四郊的岳麓山、裕湘纱厂、北门外、协操坪、火车站、小吴门外、识字岭和南门外等处，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从长沙市人民政府1981年10月所编《长沙市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查出，在上述几处被杀害的70位烈士中，就有41位烈士英勇就义于识字岭。

他们是：长沙市教育工会工作人员刘恒顺、长沙市裕湘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常建勋和女交通员陈福纯、长沙市人力车工会委员谭汉俊、中共长沙县委会书记朱有富和委员罗建山、中共长沙县十七区区分部秘书彭炳初（以上被害于1927年）；长郊农协妇女部副部长刘东顺、长郊农协青工委员柳约礼、长沙市商民协会宣传委员徐亮彩、中共长沙市委会书记仇寿松、中共湘南特委委员罗义生、长沙市泥木工人纠察队吴龙江、中共湘西特委书记舒玉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熊亨瀚（中共地下党员）、长沙县高塘乡农协委员黄赞（曾用名黄宇一）、长沙县五美乡地下党支部委员陈季临和农协会长陈炳文、湖北省总工会宣传员杜冬生（以上被害于1928年）；长沙县承祖乡赤卫队队员吴保林（被害于1929年）；长沙市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刘春林、红三军团五军一师补充营党代表邹树云、平江县十八区湖源乡赤卫队队长桃如廷、中共长沙市委会宣传部长陈龙骧和秘书周应铭、红三军团军粮主任欧振藩、中共长沙县中心县委工作人员彭道生、红三军团交通员邱桂泉和战士邓庆生、红八军四师二团一营三连战士何桂生、长沙县龙华乡赤卫队长彭顺生、长沙县农协委员长陈福泉、中共湘赣特委书记杨开明、湖南省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陈洪年和杨开慧、长沙县锦绣乡农协主席熊正湘、长沙市郊区农协会委员长苏启勋、中共长沙县委秘书周寿钦（以上被害于1930年）；长郊十三乡农协委员长张笃安、中共湖南省委会书记蒋卓（长卿）（以上被害于1931年）；市郊地下党支部工作人员李菊卿（被害于1949年）。以上41位烈士，其中有共产党员38人，占92.7%，非党同志3人，占7.3%；男性38人，占92.7%，女性3人，占7.3%；除一人出生年月无据查实外，40人的平均年龄为30岁；在郊区几处公开被杀害的70名烈士中，刘恒顺牺牲日期为1927年2月20日，可能是最早一个被害者；李菊卿牺牲日期为1949年7月20日，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害者，均在识字岭就义。由此可见，识字岭是反动统治者的大屠场，但也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志士正气昭著的地方。解放后，长沙市郊区党政领导机关已在这里巍然建立了。

以上统计数据仍不完全，因该《英名录》仅包括市、郊和长（沙）、望（城）二县，又是按烈士遗属在当地而编的，特予说明。

**（编者）**

# 红色曙光照长沙

## ——杨茂洪同志策应红军进城事略

饶学宇　王正怡

杨茂洪同志是1926年滕代远同志在长沙市郊区组织农运，首建近郊农民协会的十三名委员之一。他生于1892年，家住周家湾（现马王堆乡五一村）。作菜园为生。青年时期肄业明德中学，结识了我党地下人员，受到革命启迪，立誓跟着共产党闹革命。1926年经叶松林、胡柄文同志介绍入党，任郊区农民协会财务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各乡农会被迫解散，在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中，杨茂洪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担任了党的地下联络工作。1928年8月的一天，反动团防局派兵包围周家湾，抓了一名原农会委员徐仁杰和另一革命群众，绑在树上，并将当地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驱赶出屋，团团围住，扬言要抓赤化首要分子杨茂洪。伪兵连长扬着马鞭逼问群众："你们中有谁是共党？谁叫杨茂洪？"可是杨茂洪就在群众之中，谁也没有指认。当敌连长走到杨茂洪前吼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杨茂洪？"杨茂洪毫不惊慌地说："我是不是，你就问大家吧！"有几位老乡亲说："我们这里姓杨的有好几家，他是我们这里作菜园的老实人，名叫杨正清（杨在当地的名字）。你们要抓的杨茂洪确实早逃走了。"结果那次仅抓走了那两位被捆绑的同志。杨茂洪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得以脱险。



1930年7月彭德怀将军率领工农红军第三军团进攻长沙。军阀何键所部望风披靡，仓皇溃逃。城中那些富商阔佬及近乡地主豪绅，在红军兵临城下之际，亦惊慌失措，夹着尾巴，纷纷逃窜。一部份工商业者来不及撤离，连夜砌夹墙、挖地洞、隐藏金银货物，致使全市闭市。那些地痞流氓，扰乱街头，趁机抢劫。幸有我地下党及时组织工农纠察队，臂佩鲜红袖章，手持标梭大刀日夜巡逻，维持秩序。

杨茂洪在郊区地下党的领导下，在贺家圹枫树坪秘密成立了三十多人组成的梭标队，主要担负策应红军进城的工作。当红军兵临近郊时，杨茂洪带领几名队员，深夜潜往五里牌一带，将敌所布电网多处剪断，致使敌人设防失灵。同时，杨接受我地下党另一艰巨任务，要赶在红军进城前，负责串连商会部份较开明的人士和一些大商号的留守人员开市营业，维持秩序。并要筹集一笔军饷应用。杨茂洪同志怀着满腔喜悦之情东奔西走，四处联络。到处宣讲我党革命目的和红军除暴安良，保护正当工商业者利益等入城政策。其中主要工作对象即为当时长沙市绸布业商会理事长张达聪。张为杨老邻很早就受到杨的影响，对杨忘我忘家，一心为穷苦大众的革命精神，深为佩钦。加之，自己在反动军阀的淫威下，常被敲榨勒索，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此时此刻，在杨的事先劝说下，决心留城不走，并表示愿意出面组织同业中人为迎接红军进城出力。杨茂洪同志给了张一个红袖章，保护他的安全，要他首先串连几家大商号带头开市营业。

7月27日清晨，长沙市各界人士整队出城，队伍前列高举《红色曙光》四个大字的鲜红横幅，迎接浩浩荡荡的红军从小吴门、浏阳门外进入长沙市。彭德怀司令员驻扎在浏阳

门正街原德国商人韩理生公馆。杨茂洪等在四方塘青年会设立了后勤处。那几天，杨茂洪经常出入张达聪家，并接见了由张达聪引见的几家商店老板或留守人员。在杨参与的研究和布署下，于29日首先由八角亭一带绸布、百货业的几家大店——天申福、大盛、华丰、日新昌、大轮昌、时新昌等带头挂出彩旗开市营业。不到几小时，全市各大小商店也纷纷打开铺面做生意。使一度凄凉、慌乱的长沙市很快恢复了热闹的市容。人们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莫不喜形于色。

那几天杨茂洪十分忙碌，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已通过张达聪为首的商会，动员了各界人士积极筹集军饷。按各殷实商户交纳三个月房捐的办法，分配到各行业。原长沙市部分资本家，虽早逃去外地，但留守人员在革命形势的激励下，也纷纷响应捐献。有一户商号一次就拿出光洋一万元。杨茂洪等很快就筹集了慰劳金十万余元。据当时目睹者回忆说："光洋用箩筐挑。后面有几个戴红袖章，持梭标大刀的人护送。街上秩序井然，流氓抢劫分子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次红军进城只有十天，于8月6日又奉命转移了。时间虽短，但给长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兴奋之情，久久不能平息。

彭德怀同志在回忆这次战役的收获时也说过：攻打长沙城，"筹饷四十万，扩红八千人。"杨茂洪同志就是那次将家小安置在东乡长桥内弟家随红军出征的。他在红军部队先后担任过特务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职。走后不久，家中还接到他在征途上从攸县发出的一封信。暗示了他随军进发江西的去向。1930年冬，不幸在江西铜鼓作战中牺牲。

杨茂洪同志那次配合红军攻打长沙市，以他特有的胆识



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工商界拥军筹饷的活动，至今犹为人们回忆时所津津乐道和称赞。这一片断史实，也充分证明我党我军早期革命阶段就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一伟大政策，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本文两作者均系郊区人民政府民政局干部。饶擎宇是郊区政协委员）

# 撤出"音专"迎接解放

湖南省农科院　朱明超　朱　芳

1949年初春，长沙满城流传着"音专"（全称：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两个学生神秘失踪的消息，谜底至今尚未公开揭晓。我们就是那两个当事人。这段往事是当时中共地下党为了保存力量，迎接解放，巧智与敌人周旋的一段史实。

## （一）

"音专"位于长沙西郊水陆洲。1948年冬天，学校同学为了解决寒假期间的伙食费，由地下党组织了"民歌舞诵会"的公演。演出刚刚结束，紧接着爆发了"倒胡护校"运动（校长胡然在重庆时，是国民党音干队的少将）。当时形势很紧张，敌宪兵队就驻扎在学校附近，我们的行动被严密监视着。一天，同学们集队进城到省教育厅请愿，因怕宪

警乘机来校搜查，去城前，我们将日记本、团章藏放在地下室。谁知等我们返校时，这些东西不翼而飞了。我俩（朱明超：男、本名刘静；朱芳：女、本名杜桂珍）见势不妙，一个留校观察动向，一个立即进城向张维刚（建国初期任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长）报告。张维刚认为情况紧急，决定要我俩立即转移。

傍晚，杨树业（现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工作，刘静〔男〕的入党介绍人）赶到学校，交给我们两张电影票，催促快点离校，他在河边的小船上等候。不多时，我们也登上了小船，三人相对无语。湘江的水面似乎十分平静，咿呀的船桨声，搅动着我俩惜别的心情。上岸以后，杨树业才轻声地说："上了大街，我在前面走，你们稍拉开点距离在后面跟着。到了电影院，找到坐位后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大街上人来人往，十分拥挤。我们尾随杨树业，走着走着，忽然一个女人故意撞了我们一下。定睛一看，她是我们熟悉的人，也叫刘静（杨树业的爱人，现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工作）。她引着我俩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转弯抹角，来到韭菜园的一间木屋里，我们四人在昏暗的油灯下细语。女刘静告诉我们，电影院出现了情况，暂时就在这儿呆着吧，千万不能出去。

我们在这木屋的楼上呆着，第三天的晚上，胡鹏（解放初期任中共长沙郊区组织部长）、黄人凌（现任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人来了。胡鹏穿着一身旧呢大衣，神态严肃。一进屋，随手拖张长凳叫我们坐下，询问我们近两天的生活。接着又向我们了解"音专"发展组织的情况。最后他说："组织决定派你们到湘西北的游击队里去工作。湘北



靠近长江，将来解放军渡江，需要我们接应。"他望着刘静，"你在广西打过游击，你们去很合适。"他继续说："为了工作方便，现在跟你们改个名字。刘静改名朱明超，杜桂珍改名朱芳，芳草天涯的芳。你们俩都是广西人，说话的口音和常德一带差不多，就化作俩兄妹，说是东安人，和唐生智同乡。朱芳到那边后任小学教师，掩护游击队工作。朱明超到队伍后，主要是搞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军从沙市、宜昌渡江。你们到达那里，组织上会派人来联系的。"任务交待完了，他从衣袋里掏出四块银元，说是组织上给我们的。接过银元，我俩异口同声地说："将来，解放了，我们带着队伍回来见你们。"胡鹏微笑着，紧紧握着我俩的手，两眼深情地望着我们。这时，杨树业把他仅有的一床棉被给我们带上路，黄人凌忙着找绳子把被子捆在自行车架上……。分手时，胡鹏又对我们说："黄人凌领你们到陈采夫家去。陈采夫是国民党水陆交通少将指挥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你们要做好他的工作。"

黄人凌推着自行车，把我们送到落星田一栋华丽的公馆里。

（二）

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红光满面的老人，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说："等你们好久了！"这时，陈夫人也忙从内房出来，拉着朱芳的手，笑迷迷地上下端详，显得十分亲热。

黄人凌把情况介绍清楚后，临走时，特意向陈采夫夫妇说："他们俩就交给您二位了。请负责他们的安全，尽早到

达目的地。”说完，告辞走了。

陈先生亲切地和我们谈话，谈他对党的向往，谈他儿子陈克朗（现在中共株州市委工作）从香港回来，带来了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方方的指示，要他和老唐（周礼）联系，积极开展活动。他说：“在慈利、临澧、安乡都有我的武装。你们这次是到太浮山谭杰（当时任突击第八大队长、现已离休）那里，组织领导游击队。那支队伍能打……。妹子就安排到石门县保宁桥镇澧阳小学教书，校长易华是我们的人……”

## （三）

我们在陈采夫家里住了两天，作好出发前的准备。王恩成（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成员，该社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外围组织）带着我们到张诚（民促社成员）家住了一宿，准备从沿河码头上船，取道津市往临澧方向去。由于开船时间弄错了没有成行，在折回到落星田陈家时，经坡子街碰上了“音专”的一位老师。

“刘静，你上哪儿去？这几天学校在到处找你们。”

不好！这个平日和胡然很接近的人，怎么会在这儿碰上了？得想法子甩开他。

“我们回广西了。今晚风大，不好过河，明天我们赶回学校。”我们边说边走，拥进人群中，摆脱了这位老师的纠缠，急忙雇上黄包车，朝黄兴路跑去。下了车，闪进巷子里，看看身后确没有人尾随，才放心走进陈家的大门。

陈采夫先生得知我们在坡子街几乎出事，急得不得了，立即加强了他住处的防护。连夜，作了一番安排后，派一位姓杨的中年护兵跟着我们登上轮船，并一直护送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临澧县七重堰。

在我们出走后，组织上通过报纸发布我俩失踪的消息，主动向敌人发动攻击；而敌人却极力否认有此事，由那位路遇我俩的老师出面，在青年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证实我们已回广西。但，我们已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从此以后，我们就使用了组织上给我俩取的名字，一直到现在。



*　　*　　*　　*

# 东屯渡迎解记

谢易

自1948年7月程潜就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以来，“应变”、“自救”、“局部和平”的口号，时有所闻，长沙的《晚晚报》、《实践晚报》、《长江日报》得风气之先，率先宣传鼓动，把“和平自救”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那时，我在《实践晚报》、《社会日报》、《长江日报》做记者。又在保安部队《正气报》做编辑，以后还在长沙绥署做发布新闻工作。

由于《实践晚报》的进步思想的熏陶，我先后参加了和平签名，迎解签名。

1949年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导发出的起义通电，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全世界，把蒋家王朝震撼得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起义将领（保安副司令）王劲修，电令我代表保安起义人员，迅速参加“迎解”工作。我奔驰报到，经

长沙迎接解放联合委员会主席曹国枢审核接纳，指派我配合刘晴波、梁琦，作为“迎解”三人代表，同去找解放军接头，洽商入城事宜。

1949年8月5日，秋高气爽，我们三人同坐一辆小吉普车出城东行，路上没有任何阻拦，只见迎解群众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我们在离东屯渡不远处和解放军相遇。由刘晴波代表与之交换暗号，解放军发出号音，部队停止前进。队伍中走出一军人，笑脸相迎。经介绍，得知他叫刘大维，是该138师宣传科科长。刘科长问清情由，即带我们去见他们的师长。到东屯渡河边，从马背上跃下一位军人，四十来岁，着旧军服，脚蹬草鞋，身躯武健，精神抖擞。通过介绍，他就是解放军138师师长任昌辉同志。任师长跳下马来，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拉我们席地围坐，交换意见。任师长表示感谢长沙人民的“迎解”厚意，但不打算当天进城。我们叙述了长沙市各界十万迎解群众，从清晨集队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坚持十几个小时，虽骄阳似火，烈日当头，仍不肯离去，长沙市人民如饥似渴地盼望解放。我们代表全长沙人民，务请解放军当晚开进长沙城，使广大群众一睹亲人为快。任师长见盛情难却，和其他几位首长稍作研究后，回头说“好！文工团先进城，大部队随后进城。”就这样，仍由我们小吉普车领路，带着文工团战士的几部卡车，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浩浩荡荡，开进了长沙城。这时欢迎的人群，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一人挨着一个，塞满街头，车辆都无法通行。老太太提来鸡蛋，小女孩送来茶水，年轻人敲锣打鼓扭秧歌。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红旗似海，歌声嘹亮，人们狂欢。全城顿时沸腾起来，群情激动，盛况空前。我忙到午夜以后才回到《长江日报》社，但却没有一点睡意。文思翻涌，奋笔疾书，写下了长沙和平解放的第一篇历史性报导。

从东屯渡到长沙，仅仅八公里，从地球上看微不能见，但这是我们带领解放军向白区进军的八公里；是开拓解放领域的八公里；是推着时代巨轮移动的八公里。是时代的步伐，是历史的痕迹，是我们每个参与其事者平生最大的荣幸。事隔三十五年，我没有忘记这一光荣的壮举，再过三十五年，我仍将以此为荣，去向马克思作今生功过的汇报。

（作者系长沙和平解放起义军官、本文原载《浏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 做好军粮工作　策应和平起义

郊区政协委员　周宗麟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为了加强起义工作的布署，命令部分保安部队，集结邵阳附近一带待命。七月上旬，我随保安部副司令彭杰如将军来到邵阳筹补军粮（我是司令部经理处中校粮秣股长），设有三个补给站随军工作。需要供粮的单位计有司令部各科、处、室，有直属警卫部队，还有一个保安团，共计官兵约三千人，日需大米四千五百斤左右。所需粮食，全赖各县田粮处在田赋谷数内附带若干附加谷征收，再行拨补。当时，湖南接近解放，而各县田粮处存心观望，藉口无粮，影响颇为严

重。司令部只好派出一部分人去邻县提拨，我便连日亲去邵阳四乡催征，工作较为困难。彭副司令治军严明，见势改变方式，不许所属官兵擅入民家采买，专派我执行购粮这项任务，规定用现洋统一收购，购好后统一分发，对内对外账目都要日清日结。所以，起义部队驻扎和经过的地方，秩序良好，受到群众的欢迎。

8月4日夜，我刚从乡下购粮回部队，彭副司令找我谈话。先是询问军粮工作情况，接着又讲解放大军进展的形势，最后，欣然告我："程、陈两将军已正式宣告起义了。"湖南和平解放，是湖南军民由衷的意愿，我听了这个消息，欣喜若狂（这个消息，白天已在军中宣布）。彭副司令又向我交代，要听候命令策应事变，绝对服从指挥……。当晚，我刚就寝，忽听号声四起，部队紧急集合。我随即收捡了一些重要单据和文件，与彭副司令同乘一部大卡车出发。汽车在返长的公路上行驶，茫茫黑夜，又地形生疏，令人方向莫辨。及至车停，方知到了廉桥。总值日官随即奉令查点人数，除有个别中途逃亡外，大部都已到齐。是晚，部队在此宿营。次日天明，蒋机即更番骚扰。因廉桥地形开阔，不便久留，部队又奉命前进。

刚到湘乡县衡子口，先头部队发现了情况，彭副司令命令停止进前。部队就近驻扎，召开紧急会议，布署军事工作。我即与当地负责人联系，按时价秤收农民兄弟送来的粮食，由出纳室付给硬币（银元）。一面秤收结款付现，一面把粮食分发下去，方式尚称灵活。时近傍晚，我保安部队与白崇禧残部发生遭遇战，一时枪弹飞啸，林木铮铮。我想起当日购进的四千来斤军粮尚分储在农家，便分别与各农家计议，作好伪装，以免发生意外。身边未用完的硬币三百多元，作五十元一封用粗纸包好，贴身带着，谨防惹人注目。此刻，我又要护粮，又要护款，东奔西跑，心绪极为不安。幸经理处彭绍麟副处长即时赶到，帮助保存现款，我才减轻一些思想负担。夜半，枪声渐渐稀落。翌日拂晓，匪部如豕突狼奔，惊惶逃窜。战后我清点参战人员，仅有少数伤亡；又查寄放各农家粮食，并无半点短少。军中用粮得能照常分发。在衡子口驻扎三日，又奉令向杨家滩前进。

在行军途中，沿路贴有巨幅鲜红的标语。上写："热烈欢迎保安部队起义归来。"、"向程、陈二将军致敬"、"向全体指战员致敬"等。杨家滩集填上，这类标语张贴最多。部队驻扎这里开始整休，吃粮仍采用就地收购、分发的办法，秩序井然。一周后，部队又奉令进发，我们很快地回到了解放后新长沙的怀抱。

# 建国后长沙郊区出土文物简介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　杨　桦

湖南省会长沙，是祖国南疆的重镇，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由于历代战火连绵，地面上的历史文物多被破坏，而深埋在长沙郊区地下的文物却幸存不少。这是一件极其可喜的事。建国后，从郊区境内所发掘的文物来看，不仅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而且量多质美。因此，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长沙能誉称祖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与郊区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分不开的。下面，仅就建国后郊区出土的文物作个简单介绍，以飨读者。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东郊五里牌发掘古墓葬时，在战国墓穴的填土中，发现有磨制的石斧、锛（bēn奔）、石箭镞（zú族）和粗犷的绳纹陶鬲（lì力）、腿、陶片等。1955年春，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清理工作队在南郊大托铺工地，采集到磨光石斧、石锛、石凿、石箭镞和硬陶绳纹陶片等。1956年又在西郊黄家洲、傅家洲及附近湘江西岸的河床上发现古代遗迹火坑多处，在火坑内清理了一些磨光石斧、石刀、网坠和绳纹陶片等。从以上发现的石器等物看，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足以证明，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部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郊区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开拓。他们与大自然进行搏斗，创造了原始社会的文化。



1963年春，在东郊黎托乡东山镇一农民家的水沟里，发现一件商代的铜鸮（xiāo）销）鸟提梁卣（yǒu友、盛酒器），色泽光莹，兽面花纹清晰精美。该件曾被调到北京参加出国展览，堪称国宝。

1957年秋，在东郊市蔬菜公司工地发掘一批石器，有斧、锛、、箭镞、砺石等13件等，还有陶豆、罐、纺轮、网坠和绳纹、方格纹、蓆纹、划纹、附加堆纹的铃形器、大口器、圜底器的陶片等。根据器物的形制判断，证明这里是西周晚期的文化遗址。1958年11月修京广复线时，在南郊太子冲的田垅上取土，清理出一些石刀和砺石，还有一些不完整的陶鬲、豆、罐、钵等，其器形与湘阴县春秋古罗城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特征相同，证实该处属春秋时代的遗址。

春秋时期，长沙已成为楚国南方的重要城镇。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被称为楚墓，出土的文物也被称为楚文物。郊区发掘的春秋战国墓约有两千余座，出土文物最多。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的文物有绳纹陶鬲、钵、豆、罐，铜器有剑、戈、矛、素面镜等，偶有铁剑、铁削、凹字形铁口锄等生产工具。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战国墓的随葬品多铜、陶器，有鼎、敦、壶、豆、钵、匜（yí怡）等成组出土。在木椁墓中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也保存得更完好。除陶、玉、铁器外，有丝织品、漆木器、漆剑鞘、竹简、缯书、帛画、青铜剑、篆书铜戈与戈镈，还有毛笔、天平法码（古代的戥子秤）和琉璃器以及图案花纹精美的铜镜等。这些楚文物，有的算是稀世珍品。兔毫毛笔就是笔祖宗，它改正了秦蒙恬发明毛笔的历史记载。戈剑兵器，锋刀坚锐，可知当时人们就精于铸造工

艺，并具有文事武备的业绩。

在东郊张公岭东风村砖厂工地发掘的近百座战国时代的古墓中，还出土了越式鼎、越式铜剑、铜矛等文物。这充分说明了这里原是越国的属地，被楚国侵占后，而越人仍长期沿用本族的葬俗、葬物。这些文物对研究楚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增加了新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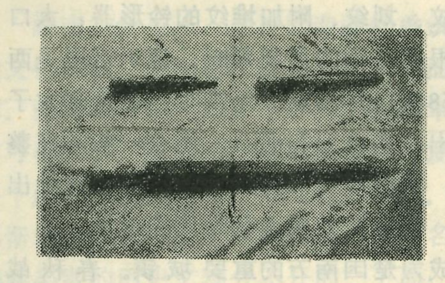


图1　战国铜剑（上左）
铜矛（上右）
越氏短铜矛（下）

虽然，秦统治的时间只有十五年（前221—前207年），郊区发现的秦墓很少，但出土的文物仍多。1957年，在市东南郊左家塘皮件厂工地，发现了一座部分被盗的木椁墓，出土的陶器有四鼎、四盒、六壶、四勺、六璧；铜器有素镜、铜戈、铜矛；还有玉璧、木俑、骨簪及铁口锄等。其中最有重大价值的是长胡四穿铜戈，戈上有“四年、相邦吕不韦（造）……”等小篆体字铭文（吕不韦曾为秦相。四年，即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此戈是秦中央官工的制品，秦取长沙后入出的。此外，在南塘冲清理了一座土坑墓，出土有铜鼎、铜盆，蒜头铜壶和陶鼎、陶钫（fāng方，又名方壶）等。鼎壶的形制与出“相邦吕不韦”戈的墓完全相同。因此，大素面镜和蒜头壶被认为是秦墓的特殊标志。这些文物的出土，给监别秦墓、研究长沙地区的秦文化，都提供了



极其重要的标本和资料。

郊区境内发掘的西汉墓约有一千五百余座。一般小型的土坑墓，只有陶、铜、玉、石、铁等器物存在，漆木、竹、骨、丝织品等易腐器物都不存在了。最常见的有陶、铜鼎、盒、壶、钫、灯、薰、炉、洗、盘等。冥币有“半两”、“郢板”、“两板”、“金饼”或有铜“五铢”；还有石璧、石镜、玉璧、铜镜等。西汉初期的木椁墓，首推东郊马王堆三座大墓。（一号墓是轪侯、长沙丞相利苍的妻子，尸体保存非常完整。二号墓是利苍，三号墓是利苍的儿子）。出土的有漆木器、铜器、陶器、玉器、丝帛衣物、帛书、帛画、医书、地图、驻军图、天文星象图等共三千余件珍贵文物。其中最有重大价值的是十二万字的帛书和几幅图籍。帛书共有二十多种，有《老子》、《经法》、《汉书》、《艺文志》和道、儒、墨、法各家的书，还有《天文书》、《医书》。医书上有治五十多种病的近三百个医方，涉及内、外、妇、儿和五官各科病症多种疗法。图籍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县城的平面图和车马仪仗图等。这些帛书、帛画、图籍等文献的记载，对专家、学者研究春秋战国和秦户的礼制、医学、天文、地理、音乐、军事等提供了最好的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价



图2　西汉　木俑

值。马王堆西汉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引起了中外考古界的重视，人们称这是获得了祖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宝库。

1974年和1978年，在西郊咸嘉湖畔发掘了陡壁山、象鼻咀两座以“黄肠题凑”、“梓宫便房”为葬具的大型的西汉墓，为研究汉代王室的葬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发掘的陡壁山曹嬕（xùn训）墓，出土了很多精美的殉葬品，其中的三方玉石、玛瑙印章以及双面透雕奔鹿玉佩、玉雕饰，是汉代文物中的上乘之品。

在郊区汤家岭发掘的张端君墓，就是西汉晚期较好的墓葬，出土了16件有铭文的铜器。铭文为阴刻隶书字体，既有墓主人的名字，又有器物名称。如“张端君斗鼎一只”、“张端君五斗壶一只”等。此外，还清出“齐”字金饼一枚，重245,6克，约合当时一斤。在发掘汉武帝以后墓葬中出土的铜“五铢”方孔钱，便是研究西汉时期的货币和商业经济极好的资料。

新莽时代的文物，因王莽统治只有17年，在郊区仅有少量的“货布”、“刀布”、“货泉”及方孔钱出土。

在郊区发掘的东汉墓约有四、五百座，出土的陶器多为带有黄、绿色釉的明器（即模型器），有灶、井、仓、屋、猪圈、鸡埘、狗、鸭等。也偶有青釉瓷碗、罐和半圆扭铜镜以及水晶玛瑙珠饰等物。这些明器的大量出土，说明了当时小农经济已经很发达，也改正了过去公认的晋代有瓷器出现的说法。

郊区出土的两晋、南朝墓约有两百余座，墓砖上印有朝代年号，给墓葬及文物提供了具体时代。南郊金盆岭、北郊桂花园、东郊烂泥冲都有出土文物，多为青釉瓷器。有四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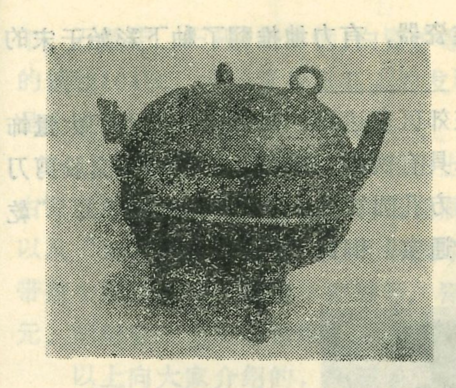


图3　东汉　陶鼎

壶、四脚炉、多脚圆砚、鸡首壶、镇墓兽、虎子等，还有情态各具的文吏、武士瓷俑等。晋墓以四系罐、瓷俑最普遍，而南朝墓以鸡首瓷壶为其特点。

隋代墓在郊区发现的不多，出土文物以青瓷为主。有扁腹唾壶、四系小罐、六系小瓶、粉盒、灯台、三足或五足炉等，还有陶制骆驼、牵马俑、牵骆驼俑、人首鸟身俑，人首兽身俑以及十二生肖俑。有时还有形制较小的隋五铢铜钱出土。

郊区还出土了五代、宋时期的很多文物。1976年，在西郊咸嘉小学发掘的一座最大的初唐砖室墓里发掘出釉色晶莹的青瓷器和清瓷俑等共86件。俑类有镇墓兽、文吏、武士、人首兽身、十二生肖、男女侍从、乐队和架鹰的波斯人俑，还有家畜、家禽等模型器。这充分反映了大唐时代大统一的政治局面。其他一般唐墓中出土文物主要为陶器和青瓷器，有四系深腹瓮，有略带米色大圈足的白瓷碗，有带有年号的铜钱和海马葡萄镜、莲花镜、八卦镜等。在中、晚时期的唐墓中，兼有长沙铜官窑釉下彩青瓷和岳州窑青瓷出土。以上唐

墓中发现的釉下彩各类瓷器，有力地推翻了釉下彩始于宋的提法。

五代十国的墓葬在郊区多达三、四百座，出土了大量饰米色釉的陶器。生产工具有铁犁、镰刀、小削刀、交股剪刀等。货币皆为马氏所铸方孔圆铁钱，有“天策府宝”、“乾封泉宝”，也有“开元通宝”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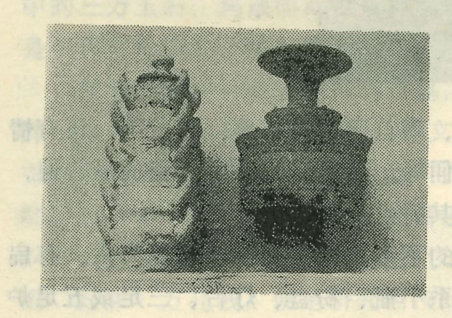


图4　五代　多嘴坛（左）
陶罍坛（右）

两宋墓在郊区的约五、六百座，出土文物以陶、瓷为主。瓷器比唐、五代时期的胎薄、质细、色白，尤其是宫窑器最为精美。所以，人称宋瓷最佳是有其原由的。出土的铜镜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其背面花纹清晰，且有吉祥语、制镜地名及作坊的款识等。其中一面秦王镜背面有铭文：“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以这样的诗句来砥砺人们要作心地坦荡的君子。出土的货币皆为方孔铜钱，多以皇帝年号命名。有淳化、至道、咸平、景德、祥符、皇宋、天圣、皇祐、熙宁、元丰、天祐、绍兴、元符、圣宋元宝和太平、绍宋、宣和通宝。南宋有高宗铸造的“建炎通宝”和理宗铸的“宋皇元宝。”1960年在东郊杨家山发掘的南宋王趯（ti替）夫妇合葬砖室墓中，出土的文物有木



印、石墓志、石砚、铜饰物、白瓷炉等16件，还有唐、宋年号的铜钱104枚。木印章与石墓志的发现，证实了墓中男主人是个爱国的，很有气节的人。

元、明时代的墓葬品在郊区出土的不多。元墓出土的有白瓷高脚杯、青瓷双鱼盘、青花瓷瓶、酱釉和黑釉的小陶罐以及“至元”、“至正”方孔铜钱等。明墓出土文物有绿釉带盖小陶罐、青花带盖小瓷罐等。瓷釉光泽，花色增多，元、明陶瓷工艺更为精细了。

以上向大家介绍的，是建国后出土的这一部分文物。如果，我们把建国前被盗挖、被盗卖的那部分算进来，长沙郊区境内出土的文物就更丰富了。这些出土的文物，是伟大祖国宝贵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来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也能从中寻觅到祖先前进的足迹。这对于我们更加了解郊区的昨天，更加热爱郊区的今天和更加努力建设郊区美好的明天，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本文图1、3、4系杨桦供稿，图2系李孔璧供稿）

# 附：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科学价值

湖南中医学院 僮俊杰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和埃及、巴比伦、印度一起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我炎黄子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创造了丰富而又极其灿烂的科学文化。一九七二年春至一九七四年春发掘的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并出土了三千多件珍贵文物，就是一个佐证。

马王堆汉墓位于长沙市东郊浏阳河畔，距长沙火车站约两公里，距长沙市中心约五公里。出土的三千多件珍贵文物，可谓都是无价之宝。尤其是一号汉墓的女尸，在这温差很大、炎热而又潮湿的南中国地下保存两千多年，完好无损，皮肤光泽且富有弹性，血管能注射，可谓举世罕见的奇迹。同时，它对研究西汉文景之治的盛况，以及剖析我国先秦的冶铸业、纺织业、髹漆业、陶瓷业、工艺美术及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更值得一提的名目繁多的精工巧绣，光彩夺目的刺绣，能显人影像的漆具、陶器，还有各种精炼别致的兵器、乐器及各种用具，不仅有文物的价值，就是工艺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不足50克重，完全可和现代化的尼龙衫媲美。无怪乎国内外来宾素有“北有秦俑馆，南有马王堆”的赞誉。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不仅在世界上堪称先进，就是在我开发较早的中华民族领域也是居于领先的地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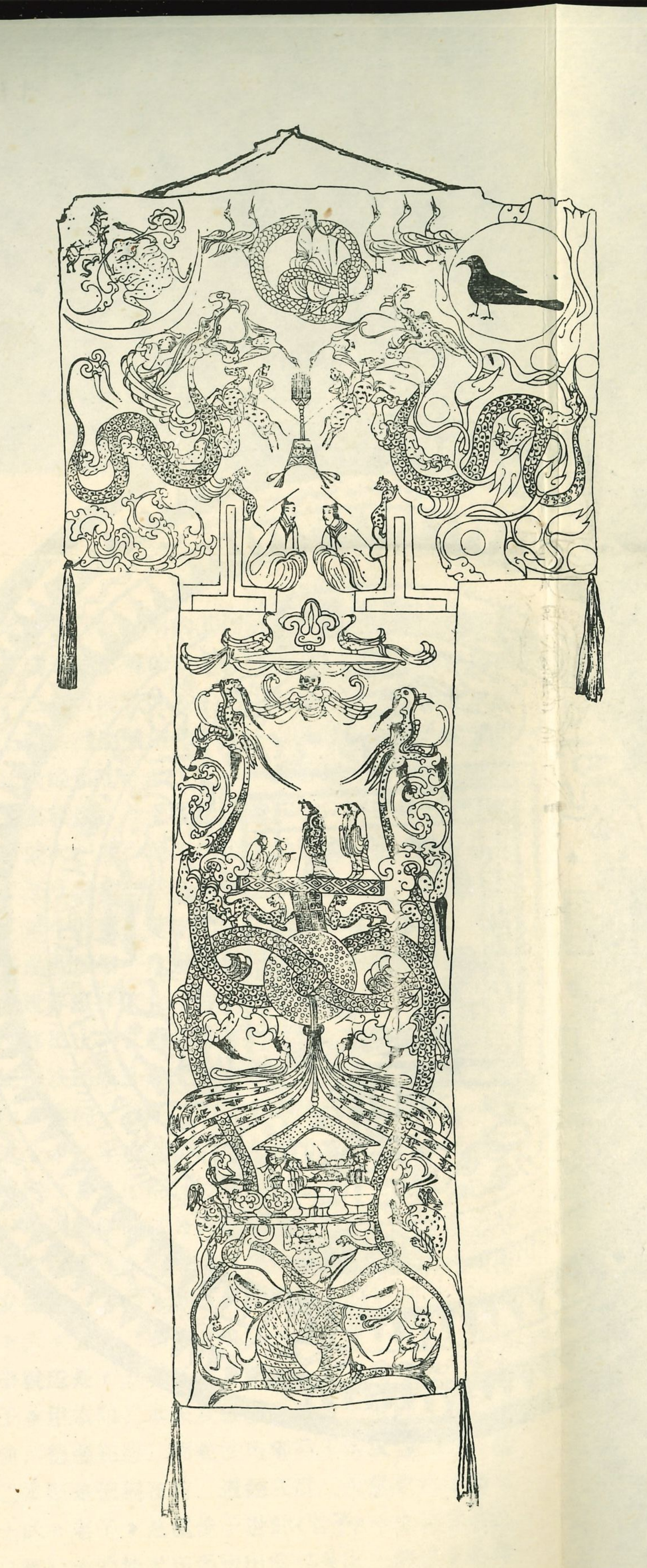


反映出长沙地区在西汉时期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一派繁荣景象。造成这种形势的根本原因一是因为当时长沙国的治理者有方，二是当时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由于连年农民起义遭到反动王朝的残酷镇压和杀掠，以及楚汉之间的频繁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严重破坏；而长沙地区距权贵之争的要塞较远，故受的影响就较小，先秦剩留的文物的保留可能性就大一些，经济恢复也就稍快一些。从已发掘的马王堆一、三号汉墓的营造及其出土文物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木牍、帛书和帛画，很多是我国第一次发现。例如神奇的彩色帛画《导引图》，堪称世界科学文化宝库的一颗明珠。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和墓窖的营造，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都能反映出长沙地区在先秦时期的科学文化水平。从出土的文物木牍的记载是：“十二年二月己巳朔戊辰……”。据史料考证这个十二年就是指的西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一六八年，颛顼历二月二十四日。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四十余年，距秦统一中国的时间（公元前二二一年），只有五十三年。说明很多文物是秦王朝焚书坑儒政策残存下来的。在马王堆汉墓未发掘前，人们一直认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是《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从马王堆汉墓一问世，我国的第一部医书就应是《五十二病方》了。马王堆三号汉墓的简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未发掘前，流传于世的《老子》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长沙市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甲乙本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大量史料证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是流传于世的《老子》一书的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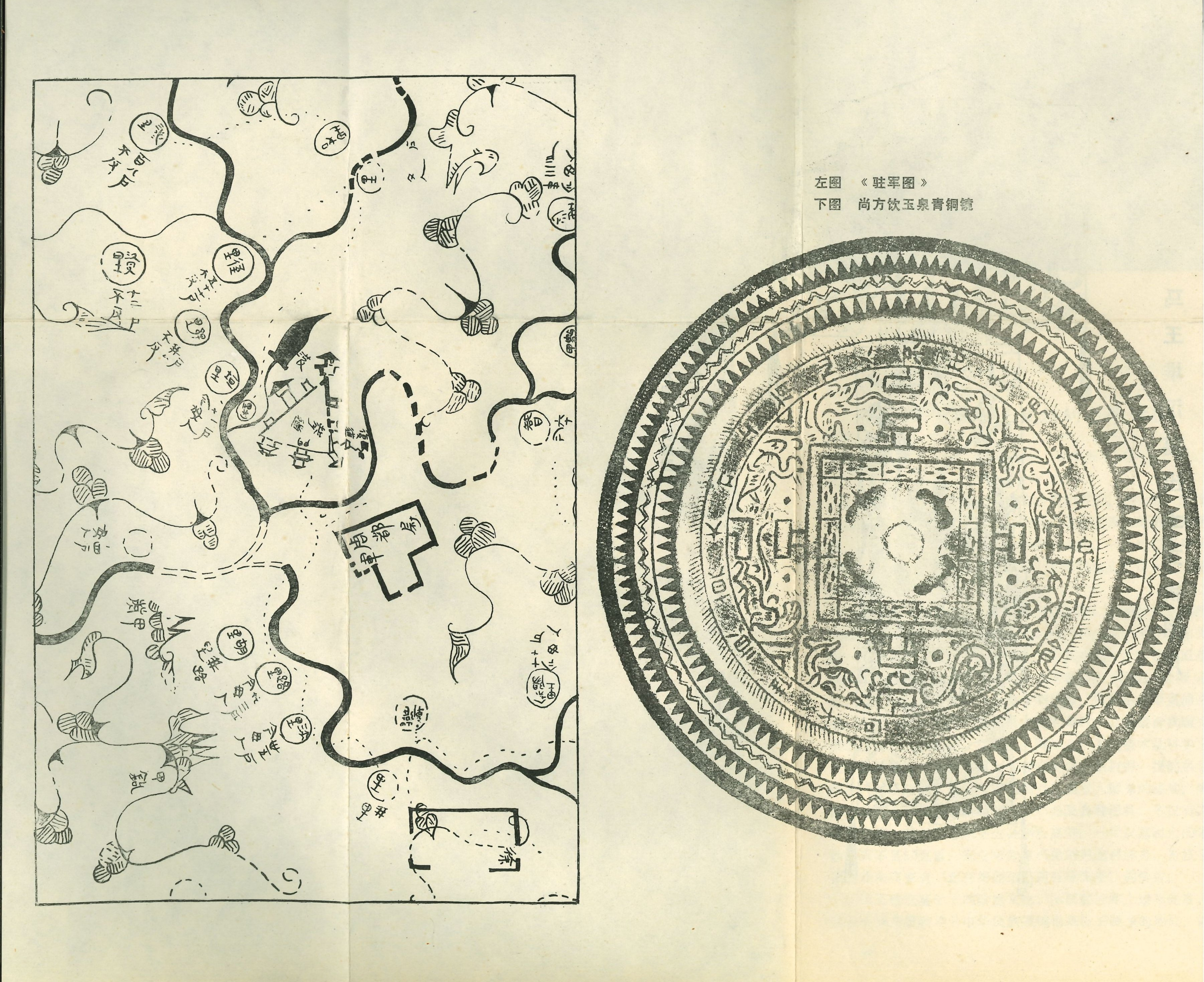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精工巧手绣出刺绣是出土的三千多件

#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图片



右图　丧服图

左图　帛画



左图 《驻军图》

下图 尚方饮玉泉青铜镜

文物中的佼佼者。它打破了史学工作者说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源于清代的说法，把湘绣的历史从二百多年，推论到至少两千多年。据传马王堆汉墓一号墓主人辛追就是一个善于刺绣的湘绣家。她的后裔在今长沙市郊黎托乡一带，这一带湘绣的能工巧匠，层出不穷，也可能与此有关。故而可以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刺绣就是后来湘绣之滥殇。我们不难看出，马王堆汉墓发掘后，它弥补了古文献的不足之处。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竹简、木牍、帛书和帛画等典籍，只能推论其历史渊源。而直接能较为有力的断代的依据是竹笥和陶罐上的封泥“轪侯家丞”和漆器上的朱书“轪侯家”。轪侯这一称呼，《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轪国，汉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长沙相利苍为侯，七百户。汉文帝、景帝破除了汉高祖刘邦的“非刘氏为王，天下共诛之”的惯例，派有功之臣黎朱苍任长沙国相。这是历史著名的“文景之治”的一个体现。汉文帝、景帝的时代，也就是马王堆汉墓主人所处的时代，汲取了秦瀛政的教益，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广用人才的措施，使生产充满了生机。在科学文化方面，废除了秦时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使先秦幸存而又散落在民间的书籍又回到国库了。到文、景及武帝之时，真正做到了“靡不毕集太史公”，汉代时藏书已是汗牛充栋了。在学术思想上，也由于废除了所谓“诽谤谣言之罪”，思想比较活跃。从马王堆出土的简帛书画来分析，不难看出是先秦幸存珍品。其它一些珍贵文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文景之治”在长沙地区出现的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千多件珍贵文物，无论从那一个方



这是一篇很重要的革命史料。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所小学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工作和斗争。这是少有的。建议再请一些老同志如戈明（原省科协副主席）等同志看看，加以补充斟酌。

**沈立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日

（编者注：此稿经省科协顾问戈明阅过）

# 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上）

## ——湖南私立育英小学纪实

湖南私立育英小学（以下简称育英学校），是一所完全小学（附设幼稚园），创办于二十年代。校址在长沙市内保节堂街四号（即原纪念“医圣”张仲景所修祠堂，今省中医学院附属二医院内）。创始人孙肇璜，曾经追随民主革命，从业新闻，为培养人才，教育救国，集资创办了这所学校，

---

面来说，都是举世瞩目的。参观了马王堆出土文物，就等于看到了古老而又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马王堆它不仅为科学家和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同时也为华夏赢得了声誉，为世界科学文化的百花园增添了奇光异彩。

职任首届校长。之后，孙肖璜、孙子昆相继任过校长职务。

## 智取学校大权 开辟抗日阵地

教师孙伟（原名俶宪），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他曾在市立十三小学校任教多年，与长沙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接触广泛，共同出书刊、办剧社、搞画展、组织“湖南文化界救国会”。他年青活跃，思想进步，是抗战救国宣传的积极分子。

1936年春，校长孙子昆患病，委托王碧联、沈宗泽和孙伟三人代理校长职务，并由孙伟掌管校印。当时，国民党甲、乙两派之争渗进了育英学校。教职员中有老一师范派的，也有长沙师范派的，他们都想操纵校董会，扩充自己的势力。1937年春，孙子昆病故。育英学校潜伏已久的校权争夺战爆发了。孙伟早就希望有一个由自己掌握的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因此，他把住校印不放，并利用一师派、长师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之扩大化，直至全体教师罢教。事情闹大了，市长何文元、教育科长刘励忠出面干涉，解散了校董会，派督学陈敬吾到学校代理校长。最后，廖力弹等人夺取校长职权的图谋不逞，只好罢休。至暑假，学校重新组织校董会，孙伟被当选为校长。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一所普通的小学校，从此逐渐变成了一个从事共产党的宣传、组织活动和进行新的教育改革的场所。育英学校在长沙教育界展现出崭新的面貌。

## 建立党的组织 壮大革命队伍

“七·七”事变后，育英学校成为党工作的重要据点，



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也从这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共党员潘开茨、石木烂等同志，借学校开会成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文抗会成立后，在育英学校举办了一个“读书会”，吸收了校内外一百多名青少年参加该会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时事座谈会。是年冬天，中共党员毛达恂、白云生、陈伯容、王自申等住进学校，开展党的工作。12月9日，吸收了孙伟入党。中共省委的高文华、叶逢钧同志，经常来学校与党的同志会面，商量工作。中共省、市、县委的通讯联络处也相继设在这里。

徐特立等同志来长沙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后，学校门口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仓库”牌子（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藉以掩护党在这里的活动。

孙伟入党后，学校进步教师也先后入了党。这时，从平、沪各地来湘开展工作的党员陆续来校任教，学校教师队伍中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1938年2月，学校建立党的支部。当时，孙伟任中共长沙市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任学校党支部书记；谢劲之任组织委员；黄力丁（原名黄俊）任宣传委员。育英学校支部直属市文委领导。3月，中共长沙市委成立，派孙伟参加长沙县委筹备工作。接着，中共长沙县委在学校开会正式建立组织，孙伟又担任县委委员。县委成立后，省委任作民同志及县区两级党的负责同志，在学校党员教师张若炎家里——长沙东乡九睦塅杨家坡，举行了为期十多天的县委扩大会议，学校党员孙伟、张若炎、邓萍（原名德润、女）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为了开展农村党的工作，扩大党的组织，学校又在长沙东乡团头河石桥冲孙家祠堂设立分校。首先派去杨极、郭起

光两个党员教师，带去学生高英、高耀世（高文华同志的两个女儿）陈元凯、李建坤、李国坤、黄正刚等。随后又派一些党员去分校任教。分校建立了党的支部。从此，育英学校在城乡两地都有了党的组织，成为党开展工作的据点。这两个支部积极组织了一支很有革命朝气的教师队伍，以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

学校教师一面坚持教学，一面积极参加抗战活动。黄力丁同志负责领导"民声歌咏团"、"新声歌咏队"；有的教师分管民众学校，抓识字教育；有的教师被派到国民党的机关团体开辟工作。这些，对广泛开展抗日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落实徐老指示　推行抗战教育

徐特立同志非常关怀战时儿童的成长。他多次到育英学校指导教学工作，指示"学校应该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教育"。根据徐老的指示精神，学校对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的一套。

学校认真研究并落实徐老关于"抗战教育"的指示。在1938年3月24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第三版，刊载了育英学校拟定的《我们抗战教育团的主张》一文。文中提出了七点主张：一、抓住抗战工作进行教育；二、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三、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四、即知即传，实用小先生制及大众先生制；五、教育均等，有钱无钱的都要受教育；六、师生共同生活；七、政教合一。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人士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强烈的反



我們抗戰教育團的主張

（育英學校擬定）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观察日报》第三版）

响。

学校在实施抗战教育的过程中，做了这样一些实际工作：编写了一部分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教材，对学生进行抗战形势教育和战时常识教育；辅导高年级学生阅读通俗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利用每天朝会时间，由学生轮流报告时事，启发学生的抗日觉悟；采用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

学合一、边学边教”等思想和方法，以《生活教育歌》作为校歌；成立学生会组织，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力，大力开展各项活动……

## 学生反帝爱国 德智迅速发展

育英学校的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在党的阳光照耀下飞速地茁壮成长，爱国激情和民族义愤不断增强。他们懂得了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儿童，也应该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也应该肩负起抵御外敌侵略的重担。

自1937年入冬以后，敌机频繁骚扰，学校把课堂移向郊外。学生会趁此成立了“庙山工学团”，以团员为骨干，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师生们每天到郊外（小吴门外庙山和杜家山今湖南省军区驻地一带）去教学，随带图书、漫画，利用课余时间作宣传。特别注意把那些躲警报的失学儿童组织起来，教他们识字、唱抗日歌曲，开展小先生活动。学校的“流动图书馆”有两百多种通俗读物，这批精神食粮，多是从平、沪回来的教师捐献的；展出的漫画有数十幅，很多是“湖南抗敌画会”的画家们所作。在郊外躲避空袭的广大群众非常喜爱这些书画，学生们也乐于为群众服务，学生与群众互相受到鼓舞和教育。当时，庙山一带山头成了开展文化活动和宣传抗战的阵地。

1938年，育英学校的学生在市内的活动更为广泛。

学校全面改革后，为了传播徐老抗战时期办学的指导思想，组织了曾炎、廷许贻光、汪应理、唐友华、荣泽凯等十多个同学去金庭、修业、市立十五小学等校，以参观者的身



分，介绍自己学校教育改革后新的气象，并大胆向这些学校谈观感、提意见，奉劝那些大人先生们，不要把小朋友关在教室里，变成“可怜的小羔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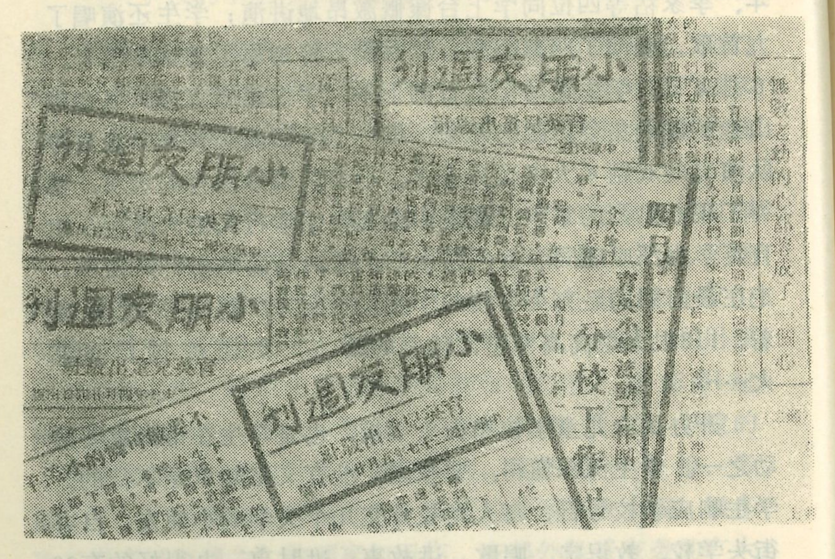
市区的重大集会、游行活动，育英学校都积极组织参加。在4月21日拥有数千群众的兵役扩大宣传大会上，陶庆年、李家祐等四位同学上台慷慨激昂地讲演；学生还演唱了九首歌，表演了四幕小剧，给兵役宣传增添了艺术的色彩。5月4日，学生运动纪念日的下午，学校派出宣传队参加中山堂的群众集会。游艺开始，第一个节目就是育英学校宣传队演出的戏剧《大家当兵去》。小演员维妙维肖的表演，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晚上，全市学生举行火炬大游行，由育英学生汪应理同学担任总指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列的是育英学校的学生。后面有广益等学校紧跟着，118根火炬高高擎起，稚气的脸上，燃烧着抗日的怒火……

开办民众儿童学校和街头学校，也是学生在市内重要活动之一。学生深深懂得：要救国，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学生响应学校号召，每人到校外交几个失学的小朋友，自办街头学校。教识字、唱歌，讲故事，讲时事。办得好的有20多所，以罗仑、张淑琼办的两所最好。6月，学校为救济失学儿童，开办民众儿童学校，免费招收50多个学生。每周授课2—3个下午，由学生奉文湘教唱歌，教识字，还讲抗战的道理。这些“小先生制”的活动，既有益于社会，又巩固了学生已学的知识。

育英总校与分校的学生有密切的联系，本校和外校的学生也经常走访或联合演出。学生接触面宽了，互相影响，也

会产生一些缺点。有个别打架的，喜欢买零食吃的，不遵守秩序的。但学校有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后，能收到自我教育的良好效果。

学生智力相应提高，在文化艺术方面较为突出。《观察日报》副刊上的《小朋友周刊》就是育英儿童出版社主编




载1938年《观察日报》

的。学生的习作有诗歌、小剧本、工作报导、书信、故事、散文等。这些文章能紧紧抓住抗战的主题，反映学校生活。学生对宣传演出很有兴趣。他们学歌排戏，一教就会。这一时期流行的抗战歌曲如《长城谣》、《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几乎人人能唱。演过的戏剧有《一条心》、《捉汉奸》、《扫射》、《小杰》、《台儿庄上》



等。其中也有学生自己编的。在这些宣传活动中，学生潜移默化接受了艺术的陶冶，提高了文化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孩子的心灵上，对共产党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当育英学校党组织在部分少年儿童中动员去延安参加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时，有不少的学生和少年报名。因为年龄和家庭的原因，只选派了黄练刚去延安。当他在育英学校门前登上大卡车出发时，不少学生含着羡慕的眼光欢送他踏上征途。

## 适应形势需要　工作转移农村

1938年9月，全城大疏散。市内育英学校决定与分校合并，全迁农村。教师们领着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来乡就学。这时学校的党员教师还有戈明（原名龚金球、女）、王若沙（女）、卜明（原名濮懋文）、李普（原名任练）、赵彤（原名础石）等人。支部属长沙县委领导，孙伟仍兼任书记，卜明任组织委员，黄力丁仍任宣传委员。支部在学生中还发展了李建坤（后改名李范）、康明超（后改名康健）、李如一三人入党，和教师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为地方党组织传递文件（1939年3月，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流动到湘潭，因形势变化，党组织决定学生中的党员不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支部曾再度选送学生去延安深造，因交通断绝，未能成行。

学校合并后，教室不够，将初级小学迁往附近的黎家咀，取名育才学校，仍属育英学校领导。

学校开展战时教育，除坚持正常的课堂教学外，课外还开展了政治学习、生产支前、军事训练、文艺宣传等有益的活动。

当时，日军攻陷武汉，威逼长沙，人心紧张。学校组织

师生共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久持战》等著作。两周的讨论中，大家针对当时的"速胜论"和"亡国论"展开大辩论。通过学习辩论，师生们认识到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的正确性，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学校生产支前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两所学校周围的荒山野地，进行大面积开垦，种上油桐和油茶；一是组织农村妇女和学校师生一起，为前方战士日夜赶制寒衣。另外，学校还捐募了一批新旧寒衣送交抗敌后援会救济难民。

学校教师带头搞军训。白天利用课余带领学生到山间去打游击、捉"汉奸"；夜里搞紧急集合、急行军。教师戈明接近临产期，还领着学生在山坡上卧倒、奔跑搞军事演习。大家休息下来就唱起《打杀汉奸》、《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和教师黄力丁谱写的《爬山运动歌》等歌曲。师生们进行军事训练，情绪火热。

学校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在农村开展抗战宣传活动。罗孝荣、孙阜民、黄正凡、黄正刚、杨开云(女)、李长福、孙叔秋、孙月秋等十多个学生参加了"育英儿童抗战团"，利用假日、节日排练节目或外出宣传。学校周围及远距数十里的集镇如团头河、鑫斯港、东山、大桥、嵩山寺、五美山以及浏阳的柏家山、镇头市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打着"育英儿童抗战团宣传队"的旗帜，提着饭盒，背着图书、漫画、道具、化妆用物来到集镇上。有的在墙上刷标语、贴海报，有的围在一起唱歌，等到把群众号召拢来了就开始演出。在演过的许多剧目中，以《放下你的鞭子》、《炮火下的孩子们》、《最后一课》的场次最多。在浏阳镇头市的宣传大会上，有工、农、商、学各界参加，观众达千



余人，最有秩序，演出的效果也最好。

由于党的工作需要，育英学校在育英儿童抗战团的基础上，孕育了"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是年12月25日，这个团正式诞生了。（编者按：该团史实后续）。

育英学校分出了很大的力量去领导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教务更为繁重。留下的教师坚持授课，还办民众学校，利用夜间教农民识字、算术、珠算或讲时事。也挑选了少数高年级学生去任教。学校仍组织部份师生到附近学校参观访问和搞小型的文艺宣传。

**根据省委指示　先后转移隐蔽**

1939年到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党组织决定留在乡下育英学校工作的党员先后隐蔽、转移了。王若沙坚持到最后，于1940年夏才离校。国民党特务多次追捕她，均被群众掩护脱险。

"文夕大火"已把市内育英学校的三层教学大楼化为灰烬，余下前半部几间简陋校舍，由孙吴珊娭毑一家三口住校看管。

"第一次湘北大捷"的前后，在湘中、湘东流动宣传了九个月的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曾一度回到了乡、城两个母校的怀抱。

1940年春，孙伟借市立十三小学的校址，恢复了育英学校。长沙县教育当局有意刁难阻挠，以不能拨给私立学校经费为藉口，硬将育英学校更名为长沙市立第三小学，并扬言要逮捕孙伟。

孙伟担任了不到两个月的市立三校校长，中共省委派杨

第甫同志通知他撤离。他当即离开湖南，北上抗日。

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逆流迫使育英学校结束了它的峥嵘岁月。但，在这所抗战教育的摇篮里经受锻炼、成长的共产党人、革命青年和爱国的儿童们，在以后的抗日烽火里，在解放战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仍在继续向前迈进。

（原育英小学学生、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团员

张若曦、李炎坤等搜集整理）

# 湖南抗敌画会在郊区的宣传活动

陈国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仇恨已极，我们上十个朋友出于爱国反帝热忱，自动组织了湖南抗敌画会，赶画了一批抗日宣传画。内容大致可分四个方面：一、揭露日帝侵华野心和暴行；二、有关祖国东北、华北地区各项资源的主要数字统计图表；三、沦陷区游击队和人民的抗敌活动；四、一般防空知识等。由于当时经费困难，所有画幅均系纸画，大小共约百幅。我们先后以抗敌巡回画展名义，在长沙省城中山堂、育英小学、民众俱乐部及靖港等地展出，观众反映很好。但因纸画易破，经常要换，后经孙伟积极设法，找到国民党省党部搞来几匹白竹布给我们重画。当时，我家佃居长沙浏阳门外念佛林楼上。这儿较僻静，庙里房子也宽，又没什么干扰，很好作画。在我家作



过画的，有周令林、周令钊、唐亥、朱人鹤、黄甫苏等人。李仲融和孙伟都来看过，还提过一些建议。后来，我们在一次展览中偶然遇到华中美术学校老同学张仪，她当门主动地捐献出她爱人沈逸迁（画家）的遗作——几幅大的抗日宣传布画。我们把它挂在展览会上，更加增强了展出的效果。

由于战事日益紧张，敌机经常轰炸，在城市搞大型展出已有困难。我们只得随着形势的变化，把宣传的规模化大为小，选出一部分适于农村流动宣传的中、小型画幅，带到乡下宣传。我们曾经到过城郊湖迹渡、白马铺等地，利用大路边的茶铺、庙宇作展出场地。观众多则数十人，少则上十人，不论观众多少，我们都认真讲解。有一次，我和周令林去白马铺宣传，他还找了位东北流亡的中年同志一道去，让那同志现身说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诉说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强烈地激发了观众对敌人的仇恨。我们又接着宣传抗日救亡的重大意义和怎样以实际行动来保家卫国等。我们流动宣传到哪里，有的观众就紧跟着到哪里。他们屡听不倦，屡看不厌。象这样的小型活动，在城郊还搞过多少次。

由于时局剧烈变化，朋友们都先后分散，我家避迁到长沙西乡（现望城县坪山）亲戚家。但我和周令林、杨明志仍留原处，利用晚上工作。周令林借来油印机，我们共出了两次油印画报，内容都是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游击战的。因印刷条件差，刻写技术也不够好，一次只能印二、三十份就破了，有的还不够清楚。我们选出一些印得较好的，带上浆糊，去滦湾市、望城坡、坪山一带张贴，有的则分送给过路的人们。

1938年9月，孙伟离城，行前要去一些画幅，他还要我

# 湖南儿童专科医院始末

长沙大学　柳轻飏

湖南儿童专科医院为我省著名中医易南坡先生创办。院址在原长沙市南门外回龙山二里牌，即今省体育场东南角，占地面积近四十亩。

湖南儿童专科医院是一所私人开设的中医院，规模包括一个门诊部，一个住院部。住院部设有病房十间，病床二十个，医、护人员、工人二十余人。

长沙市是湖南省会，一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多，也是各行各业人才荟萃的地方。解放前开业中医就有数百人之多。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他们纷纷开设中医诊所和医院，一是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抗当时执政者对中医的迫害与摧残。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国医院，国医研究所，卫生报，医学月刊等中医药团体也相继出现。湖南儿童专科医院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湖南儿童专科医院，原名南坡儿童医院，是以易南坡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该院约1930年创建，初期只办一个门诊部，地点在仓后街四十六号。担任门诊的有黄碧君医师

---

们画了几幅宣传抗日的连环图，给他所领导的育英儿童团作宣传用。我们抗敌画会留下的大批大布画，后由李昌鄂带到平江展出去了。

（本文作者系湖北省博物馆离休干部）



（易南坡先生夫人）以及随易南坡先生学医、出师后留下来的王道农、陈汝贤，刘禹贵等。湖南国医专科学校部份毕业生与在校同学也经常来这里实习。由于医院是专门儿科性质的，加上主办人在社会与医学界的名声，地点又居于城市中心，诊务相当繁忙。每日就诊的百多人。但仓后街门诊部房屋有限，没有条件进一步扩充与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医院积极着手筹建住院部，准备学习西医院的一些方法来加以扩大。市区内没有合适的地方，也不适宜搞住院部。经过王道农等多方努力，最后觅得郊外原广东医院（前身为广东会馆）旧址，随即着手维修与兴建。

原广东医院在南门外回龙山二里牌。正门在二里牌路边。南面是小林子冲。靠北一大片义山，一栋矮茅屋，住了一、二户人家，人烟稀少。靠西有树木成围。医院进门一片花园，房屋则依地形分三个阶梯，三部份。一层平房杂屋约二十间，二层三开间平房一栋，三层最高，有房屋三、四间，即今体育场东南角最高处。医院是广东同乡会的公产，因地处僻偏，无人使用，无人管理，已经荒芜残破不堪。易南坡先生购得后投资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四周全部围墙房屋作了改建，花园精心修饰。完成后，环境安静幽雅。进门设有挂号房、诊室、办公室，一长排房间，其中包括病房十间（床位二十个）、护士室等。

医院设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董事会，长沙一些社会名流大多应聘为董事。管理实行院长制，由易南坡先生任院长。下设办公室，担负行政，医院具体事情的办理由王道农，负责。所有经费自给自足，来源包括仓后街门诊部，南门住院部（设有门诊室）的收入。由于业务发达，来门诊和住院的

较多，经济上基本能够维持。

医院内部管理，除了私人带徒外，公开招收了护士多名（现尚健在的有周乐群，谢伯鸾等），也部份实行了西医院的办法。用挂号制，门诊病人有详细病历，住院病人设有病历袋，使用体温器测量患者温度。住院病人由医院专人负责煎制中药，护士定时给药，护理。有一定的休息制度，一改中医传统的个人自由工作的习惯。

医院特别注意环境，饮食卫生。经过修整的花木，四季常青，有专人负责培植，曾两次举行菊花会。原有的饮水井，虽然水质好，但上无盖，四周洗衣、洗菜极不卫生（当时无自来水）。医院设法改进，用木炭、河沙、棕等过滤井水，保证了用水的洁净。

对于医院工作人员的业务提高，易南坡先生也非常注意，请了西医来讲一般的医学知识，教会了很多人注射、量血压和常用西药的知识。宁乡崔黄山先生曾经长期住在医院，为医、护人员讲古典文学，帮助提高阅读中医书籍的水平；还特别注意书法，规定每人要写大字。

当时，长沙市私人开设的中医诊所、医院虽多，但附有病房、病床，全部服用中药治疗，分专科的仅只有一、二家。医院全部开放后，原仓后街门诊部业务并没有减少，因可以住院，来就诊的反而增多。住院部地处城乡要道，附近诊所少，这一地区及长沙县的人民来住院的更多。医院南门门诊部每天接待的病人有百多，其中市郊，县区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各地相继沦陷，不少名医内迁或者路过湖南，医院都热情接待。北京的施今墨大夫，四川的



任应秋医师等，都曾长期或短期在南门住院部住过，其中有的还担任过医院的门诊工作。因日本飞机经常骚扰，医院在院中靠山处修建防空洞。施工中掘出一个古墓，内有很多陶器，因当时无文物知识，都被甩掉。医院把古墓的墓室加大，筑成一个大防空洞，一遇日机空袭，市内同行纷纷来医院避炸。1938年秋，日机空袭长沙，医院内数处中弹，前围墙部份炸坏，厨房、杂屋震塌，医院人员幸无死亡。紧接着文夕大火，又遭浩劫。几经破坏之后，仅余一层房屋八间，医院住院部从此停办。门诊部曾分别迁沙河街、学院街等处，但规模已不如前了。

# “过激”名传贼胆寒 青史毋忘记尔康

## ——贺尔康（又名过激）烈士传略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湘潭韶山以南约八华里的地方，有一户贫农家的少年名贺尔康，从小聪颖好学。1922年，尔康十六岁，经毛泽东同志带出家乡，介绍到长沙自修大学附设补习班读书。次年，录取进入由毛泽东、何叔衡、夏曦等同志创办的湘江学校。贺尔康是学校的优秀学生，深得何叔衡等同志赏识。叔衡同志视尔康如己子，躬亲培养，关怀备至，要求亦严。贺尔康在校学习两年多，所写的日记中有不少篇幅谈到了何叔衡、夏曦等革命前辈对他的谆谆教导，使他从憧憬革命到认识革命，从而下决心投身到革命激流中，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贺尔康在校时曾取名“过激”，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称共产党为“过激党”。而贺尔康在署名“过激”的一篇作文中大声疾呼：“人类社会的进化已指示我们：不能不走共产主义的新路了”。他毫不隐讳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干脆取名“过激”，以示迎接反对派的挑战。

1925年，正值“五·卅”惨案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帝高潮。这年暑假，贺尔康跟随毛泽东同志到湘潭二十多个村、乡建立了“雪耻会”。同年六月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贺尔康与毛福轩、庞叔侃、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等为该



支部第一批党员。

1926年，毛泽东同志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致函韶山党支部，请选派两人去讲习所参加学习。支部即派贺尔康与庞叔侃前往。他们在讲习所听了毛泽东同志讲课，随后不久，被派回湖南在长沙、湘潭、衡山等地搞农运工作。

1927年，贺尔康同志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前往衡山开展工作，是衡山地委七名常委之一。地委书记是向均同志。这年元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到衡山，地委派陈新宪和贺尔康陪同毛泽东同志到城乡各地考察农运工作。在十多天的考察活动中，毛泽东同志从衡山县衙门一名小狱吏处，得知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有乡农会干部，就在地委会议上指出这类事件的错误性很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并对贺尔康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向均同志立即派陈新宪、贺尔康二人前去县公署交涉释放。毛泽东同志又向他们说：“你们两位是省里派来的特派员，可以正正当当地命令该县知事立即释放在押的农会干部，以后不得擅自派兵捉人”。

通过陪同毛泽东同志考察农运工作，贺尔康亲聆不少教诲，学会了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处理当时各阶级中的复杂关系和敌我斗争中十分尖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快离开衡山前，衡山地委的同志们看到毛泽东同志日夜操劳，十分辛苦，想留住几天稍事休息。贺尔康因与毛泽东同志是师生关系，便说：“老师来了，弟子还没来得及招待，也想和老师叙叙家常哩！”毛泽东同志很幽默地当着向均同志面，对陈新宪和贺尔康说：“素我就素我，过激太过激了。你们两位亦工亦农，是素我的哼哈二将，戏还有的唱呢，家常留待以后再叙吧。”（按：向均同志别号素我）

在毛泽东同志的言传身教下，贺尔康后来在衡山领导农运工作就具有非常的胆略了。他在朱亭以南，县属油麻田一带活动。这是全县最著名的“油麻国”。大官僚、大恶霸兼大地主的刘岳峙（又名刘梅斋），便是“油麻国”的“梅大王”。刘先后做过湖南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贺尔康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就先从“油麻国”发动农民闹革命。首先抓住梅大王第一个亲信，他的秘书长阳厚荪及其走狗罗虞琴等斗起。成千的农民在贺尔康的领导下冲进阳厚荪等的住宅，喊抓喊打，开锅煮饭，慰劳乡民，吓得阳、罗等仓皇逃到省里去向梅大王涕泣诉苦一番。梅大王慑于当时农运兴起的威力，除了对“过激”这名字咬牙切齿地仇恨外，也无可奈何。那时，从油麻田以南至县城对河一线约四十华里地区的农民群众，风起云涌地加入农会。可是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多次批评衡山农民一哄几百人到地主家杀猪碾米是“过激”了，是“痞子运动”。后来，因受组织压力，虽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强迫停息下来，但贺尔康是公开表示不服的。

1927年，长沙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省会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首先遭到血腥镇压。柳直荀同志先后于5月23、26、27日，多次急电衡山，要求衡山组织工农武装开赴湘潭姜畲待命，支援省会农民围攻长沙。衡山地委当即派贺尔康带领三个中队（约三百余人）连夜出发。30日，贺尔康带领的队伍到达指定地点，直接与湘潭工农军总部取得联系并受其调遣。然而不久，却奉命撤退仍返回衡山。贺尔康同志对此深为遗憾，叹惜不已！于是他主动要求组织派他潜入长沙参加艰巨的地下斗争。



这年，毛泽东同志第三次回湖南组织和领导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并向井岗山进军，建立工农武装红军。贺尔康已奉令调回长沙和他爱人李静同志一道住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当时的省委机关。为秋收起义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

从此，贺尔康留在长沙，兼任郊区特委书记。负责组织工农群众，秘密破坏铁道、桥梁，阻挠反动部队的频繁换防，有力地配合了秋收起义计划的胜利实现。

1928年，贺尔康被衡山恶霸刘岳峙发现，被捕。于3月5日惨遭杀害于长沙市郊区识字岭，年仅22岁，其妻李静同志回到衡山后不久，亦被捕壮烈牺牲。

**（饶擎宇　王正怡）**

## 愚弄敌顽真胆略　激昂就义见红心

**——叶松林烈士传略**

叶松林烈士生于1883年4月7日。世居长沙郊区二里牌岸子上甘家老屋。种菜贩卖为生。妻吴氏，生四子。叶于1925年由滕代远、易礼容同志介绍入党。1926年10月，省委派滕代远同志组织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叶为十三名委员之一，担任副委员长兼第二乡农会委员长。主要负责筹建各乡农会，发展组织，培养、输送干部。

1926至1927年间，四郊农运风起云涌，农协会员发展到五万多人，党员近三千人。叶松林同志是杰出的组织者之

一。

长沙马日事变后，各处农会被迫解散，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叶松林同志奔走于河东、河西，继续从事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不遗余力，忘我忘家。1928年2月29日凌晨三时左右，敌伪清乡队出动枪兵十余人，突然围屋，将叶捕走，关押于伪团防局。因叛徒告密，敌伪早悉叶为我地下党的组织工作者，因而企图从叶口供中打开缺口，大量捕杀共产党人。叶受尽踩杠子、灌辣椒水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坚不吐实。几天后，敌人逼叶带路去抓地下党员或农会骨干分子。叶松林同志为了愚弄敌人，故意露面，以便向同志们报警，假供浏阳门外仙鹤楼茶馆为地下党员经常聚散处，要敌伪领他坐在茶楼饮茶。说："我指一个，你抓一个"。谁知指认几人，皆为与各团防局有联系的外围爪牙。敌特盛怒之下，更施毒打，逼叶上门搜捕。叶又带武装伪兵到地主王乾成家捉人，使伪兵再次上当。叶每次带敌伪抓人，或带镣铐明游于街，或由特务伪装暗随于后。叶有时绕道经过我党某些同志门前，指东说西，故意露相，然终未让敌人抓到一个共产党员。不少同志因叶示警而及时转移。时我党需大批干部去茶陵方面组织武装暴动，有许多同志就因此投奔茶陵去了。当时人们不明叶的斗争策略，有的议论说："叶松林疯了！"、"四疯子（叶排行第四）又带枪兵上街抓人了"。愚蠢而又凶残的敌人，多次上当而不死心，只能恼羞成怒，每次押叶归狱后施加毒打，致使叶松林同志腿骨折断，不能直立行走。叶自知必死，然赤胆忠心，视死如归，与敌周旋，胸有成竹。最后诈称自己曾埋有枪枝弹药于杜家山，可带人前去挖掘。敌伪竟又信以为真，命伪兵数人带上锄头铁铲，



用箩筐抬着叶松林同志到了杜家山。叶左指一处，右指一处，连挖数处，处处落空。弄得几个伪兵满头大汗，疲惫不堪。敌排长十分恼火，咆哮如雷，乃令伪兵开枪击叶。叶松林同志以愤怒而锐利的眼光，带着胜利者轻蔑鄙视敌人的笑容，高呼"共产党万岁"！敌伪仓皇失措连射三弹，可歌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用笺

[illegible]初先生：

你去年十一月廿日来信收阅。但对於你的发信地址看不清楚，不知正确与否。

葉松林是你的祖父，我記得他当农协代表、乡农协委员长，他是一个中國共產黨黨員。如何牺牲的我就不知道了。请你向"长沙南门外解放村18号"易钦富同志了解为好。愿你做一个革命派。敬礼！

滕代远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北京

（滕代远同志证明信）

泣的革命英雄叶松林同志，乃于3月3日壮烈牺牲于杜家山青龙庙侧。

解放后，滕代远同志任中共铁道部长，叶松林同志之孙叶冬初，因曾听其父叶仁生说过：马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遍及省垣之时，滕代远同志曾在他们家住宿几晚后，由叶松林同志于天亮前挑着菜担护送滕代远同志出城。于是，于1955年12月3日去信滕代远同志以求获得烈士有关证明。滕代远同志于1965年1月9日复信叶冬初，证明了叶松林同志的党员身份及所任职务。俟后，易钦富同志证明说："叶松林同志是个好同志。我在1950年上报中央的革命烈士名册上有松林同志"。并对冬初说："你公公是个好同志，当时清乡队押着他经我门前走我身边过，他装着不认识我，使我和婆婆、儿子活到今天。要是他叛变，当时我就是第一个要被抓起来的人"。

叶松林同志忠于革命忠于党的英雄事迹；他那愚弄顽敌的斗争胆略，以及面对敌人枪口，高呼革命口号而壮烈牺牲的伟大形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饶擎宇　王正怡）



# 市郊农运风云起　妇女革命带头人

## ——刘东顺烈士传略

长沙市郊区妇女革命先烈刘东顺同志，生于1891年，家住湖南省浏阳县镇头市，娘家姓李，幼名冬姑。16岁时与长沙市郊区红莲塘菜农刘忠良结婚，从夫姓刘，改名东顺。婚后生五儿一女，因家境贫困，不得温饱，仅存一子，余皆夭折。东顺在家操劳家务，帮助种菜，并接袜厂来料加工，维持生活。

1925年，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等同志到长沙市郊区发动农民运动，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刘东顺参加了当时党在育才中学内办的农民夜校，潜心聆听滕代远同志讲课，受到革命的启迪，有投身革命的强烈要求。1926年经丑清泉、彭光寿介绍入党。是年4月成立郊区农民协会，刘东顺任妇女部副部长，后兼任八乡联合办事处执行委员和第五乡妇联委员长等职。

刘东顺入党后，工作十分积极，成为当时郊区妇女参加农运的带头人。她发动妇女剪掉"巴巴头"，走出家门闹革命。她不为恶势力所阻，发动群众斗争了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姨太太。这个恶妇是因奸情泄露迁怒于婢女，竟惨无人道地将一个12岁的丫头活活烙死。对此，刘东顺怒不可遏，以农会妇女组织的权力，严厉惩办了这个官太太，大长了被压迫妇女的志气。从此不少妇女、童养媳都在刘东顺的组织领导

下，团结起来，进行了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

刘东顺带领妇女纠察队参加了捉拿长沙大土豪劣绅叶德辉及其震撼省城的宣判大会。不久，又组织妇女参加了斗争和镇压民愤极大的长沙粪霸黄道生，还经常抓了那些反动气焰嚣张的不法地主、资本家游乡示众，依法惩办敢于违反农会禁令的赌徒和吸食鸦片的首要份子，大大显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威力，鼓舞了人民群众斗志。刘东顺在革命斗争中受到锻炼，增长了才干，是党领导长沙市郊区农民运动中最得力的革命女干部。她坚定的革命信念；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和她善于发动群众的组织能力，深得当时郊区党委负责人滕代远等同志的赏识。

1926年毛泽东同志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曾召集近郊农会干部座谈。刘东顺是七个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她参加了三次座谈，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郊区农运的兴起和斗争情况，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和勉励，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

马日事变后，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长沙市郊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但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刘东顺没有被反动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革命进行了更艰苦的斗争。她家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站。滕代远、郭亮、易礼容等党的负责同志经常在她家召开秘密会议。刘东顺负责掩护和通讯联络工作，为同志们安排住宿，保卫安全，忠于职守，煞费苦心。当时滕代远同志领导的关于派地下党员打入反动军阀何键的警卫连，策划了81人带枪起义，以及组织农民武装攻打长沙外围九峰镇等重要决策会议，就是在刘东顺家中召开的。1927年10月，在滕代远同志率领下，组织



三百余人夜袭九峰镇。刘东顺同志领导的妇女纠察队，一手持马刀，一手提铁皮煤油桶，在桶内燃放鞭炮以助攻势。这次战役虽因泄密使敌人有所防备而失败，但大大还击了反动派镇压农民运动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为继续积蓄力量，组织武装革命，总结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为了与反动的白色恐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刘东顺同志还组织妇女配合地下复仇队，对那些为虎作伥、通风报信、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地头蛇给予了严厉的制裁。1927年6月一天的深夜，地下党组织研究要派人前去惩处扬言要抓滕代远同志的首恶份子凌保正，当建议由某同志带头前去执行时，该人稍有迟疑，性急的刘东顺连忙站起来，对坐在身边的汪庆余同志说：“我们去执行好了”。于是，由刘东顺、吴秀英两女同志走在前面，汪庆余提着手枪和龙子安紧跟在后面，四人走到凌保正住处，刘东顺喊开门，凌保正睡了觉，应声出来开门，汪庆余即对准一枪，将凌保正击毙于门口。反动爪牙凌保正受到革命的惩处，成为当时轰动城郊的一件新闻，使敌人闻风丧胆。由此，刘东顺的名字也就列入了反动派要急于捕杀的黑名单。由于叛徒任慕尧和特务龚缺子的告密，刘东顺同志于1928年古历腊月二十五日被捕。当天下午四时左右，反动派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包围了刘家。与刘东顺同时被捕的尚有家住白沙井的农会干部李春泉之妻肖冬云。敌人把刘东顺作为重要逼供要犯，进行严刑拷打，企图通过她的口供去捉拿滕代远等地下党负责人。但刘东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在牢中向肖冬云以及被捕关在一起的三个女学生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宣誓决不

叛变组织，出卖同志。相约谁能获释出去，谁就负责找组织汇报被捕经过。她对肖冬云说："你我都有儿女，如果你能出狱，请帮助照顾我的儿女。"

东顺被捕前，曾经有同志劝她说："刘三嫂，你的名声太大了，现在风声紧，你要站开一下，最好回浏阳娘家去躲避一时"。刘东顺坚定地回答："我不是胆小鬼。党没有叫我站开，我就不能走。就是死也不怕。"

东顺被捕后，滕代远等同志曾多方设法营救。当了解到她14岁的儿子刘兴友前去送饭几次都没有见到娘一面时，就嘱咐小刘说："今天是三十夜（旧历除夕），你好歹要去见你娘一面，如再不让你见，你就哭闹着不肯回家。"兴友按滕代远同志所嘱前去送饭，经一再哭求，终于被允许进去见到了娘。只见娘坐在那里，双脚被木枷锁住不能移动，头上扎一条青布巾，满脸青肿，说话时两颗门牙没有了。此时，儿子抱着娘腿大哭起来。东顺抚着儿子的头说："今天是三十，明天大年初一，你和爸爸带着弟妹在家过年，不要来了……"。初二日一早她家正准备送饭去时，谁知是一日凌晨五时左右，天未大亮，刘东顺同志却已被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城门口，牺牲时年36岁。

天亮后，由一位卖水老人报知凶讯。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家里人前去认尸，只见脸上贴着一层白纸。从她裤头上察觉是她平日所积零碎袜纱织成的，才辨认清楚，家人将遗体抬回后，埋葬于小林子冲。以后因该处山地被地主所买，又迁葬于新开铺肖家冲。

东顺同志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她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奔走于长沙



近郊各乡，领导妇女闹革命的那颗火热的心，至今仍在人民的怀念中燃烧，永远也不会熄灭。

**（饶肇宇　王正怡）**



# 冯家大屋二、三事

雷 键 敏

国营东方红农场境内，有冯家坝、冯家湾、冯家大屋。若干年前，这一片土地几乎成了冯家的天下。冯家大屋座落在延农管区东部边缘，与望城县天顶乡永安村相接。它是一座古老的地主庄园，清光绪四年（1878年）由清朝举人龚虎钦创建。房屋为两进两横的双四合院，建房不到二十年，因兄弟三人中有二人作官死于异地，龚氏家破人亡，只好将田地房产全部出卖，幸存者虎钦举人只得另建一栋瓦房，退居"杨溪草堂"。

一

清光绪二十四年（1994年），冯家有四兄弟：两人在长沙开当铺，两人在朝廷为官。因做官兼经商发了大财，一次购买了龚家的全部田地房产，仅水田就有六百九十三亩，山林面积达五百多亩。

冯家受业后的三年中，将房屋改建，由原来的四百多个平方，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个平方。共有五进四横厅：前进为一颗印式的方形八字朝门；二进为正门，左右有轿厅；三进东西建有木质千担谷仓；四进为正厅；最后五进为退堂。东苑建有月牙池，西苑建有百花园。全屋是花岗石砌台阶，路铺青石。此外，还建有厨房、茶舍、猪圈、马厩。屋外是高大的围墙，并有回廊炮眼，庄屋四周是古老的青松和高大的细叶枫树，看上去十分别致。屋前有一条由长沙通往黄金园的



青石古大道。离屋百余米的尹家坳是一个小口岸，并设有陈广生屠坊、陈德和烟铺、李含和南食店和任和福杂货铺。屋旁还有两处佃户住宅。冯的全家拥有更夫、厨工、轿丁、马仆、男女佣人等二十多人。

冯八老爷附庸风雅，愿他冯家官运财源"四通八达"，按《尔雅·释宫》中"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典故，将这大屋以"康庄"命名。过路的人远远就看到屋前黑黝黝的"康庄"两个大字。

"康庄谓道路之平坦"，冯家却事与愿违。宣统年间，冯九、冯十兄弟，在外地作官，不知何故，先后去世。权势已去，财利如水。冯六、冯八兄弟只得结束当铺，把所有财产转移到冯家大屋。

民国十年（1921年）腊月一天深夜，冯家更夫高佬子和厨工伙通外地强人，里应外合，将冯家老少全部绳索捆绑，关押起来。冯八老爷唯恐性命难保，终于供出了地下仓库。金银珠宝都被拿走，高佬子等人也无影无踪了。

冯家只得逐步出卖他的房产田地。以后，冯家大屋的部分房屋倒塌，瓦烁成堆，千担谷仓也就自然地无谷可装了。但冯家还要顾全体面，将稻草把仓填满，免得敲起来是空洞洞的响声。当地群众和过路的人都讽刺地把"康庄"叫成"装糠"，冯家从此一落千丈了。

二

1940年，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三军医院驻进了冯家大屋，这医院有院长、医官等约数十人。全军的病员，都送往这里。不到半年时间，死去的病员达二百八十多人，群众称之为陆军"冤"院。

病兵入院后，不管病情轻重、内伤外残，一律每人每天两餐糙米粥，每人限量一餐两小碗，因而轻病拖重，重病拖死。一个家住新化的新兵，瘫痪在床，昼夜呻吟不绝。一天，恰遇住本屋的彭友道从病房门口经过，那病兵即招手央求："小老板，帮个忙，买点藕粉来……"，说罢就艰难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几个钱。彭友道见他可怜，还凑些钱进去，跑到尹家坳杂货店买了半斤藕粉。将藕粉煮熟送去时，那个病兵刚吃了两调羹，嘴巴一闭，眼睛一翻，就长离人世了。

还能行走的病兵，饿起来就到冯家大屋附近去闹吃的。捉到蛇和泥鳅婆类的东西，急忙拿到老百姓家灶里煨一下，就往肚子里吞。可是，院长、医官却成天打麻将、搞赌博，把克扣的军粮偷偷地售给老百姓。有一次，一些病兵患了流行性的痢疾，他们纷纷要求院长、医官给药，医官治病下药，不论是伤是病，是轻是重，大多就是给的锅巴汤治之。病兵们对此稍有反抗情绪，便遭毒打。一天，一些病兵在一起凑了几句打油诗："抓我当壮丁，实在好伤心，一天两餐糙米粥，还要过秤称；冷热一套衣，吃的萝卜根；一身虱起绺，闹疮痒死人；胀死贪官贼，饿死弟兄们。"一个姓金的院长听见了，大发雷霆。立即叫这几个病兵出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就是一顿毒打，连续打断五根竹扁担。这几个病兵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有两个病兵遭受毒打后，不省人事，抬上床去，不到几天就活活痛死了。这些打油诗后来在老百姓中传开了，至今还有一些人能念得出来。

当时，冯家大屋的左侧横厅堂被称之为落气亭，断气了的和将要断气的病兵都往这里抬。再由三十多人组成的掩埋队抬到野猫坡、苏家塘坡一带，一排排、一行行，象贴菖子一样地掩埋着。多少年来，每当天干地坼的夜晚，一堆堆的磷火，时隐时现，状至凄凉。



### 三

长沙沦陷时，1944年4月23日，阴雨连绵，日军马队驻进了冯家大屋。住在附近排山的陈三两兄弟正碰上日军出来打闹，他们来不及跑开，只好躲在家里住房楼上的草堆里，后被日军察觉，打得遍体鳞伤。日军又用刺刀把他们的脸戳烂，烟熏盐卤。还剩下一口气，就往麻山塘里抛。兄弟俩拚命挣扎爬到岸边，又被日军拖上岸来丢进尹家坳的井里。几天后，尸体已无法收殓了。

有个三岁小孩，逃难到冯家大屋附近，住在谷炳南家里，一个日军看见这小孩了，就用刺刀戳死，还挑起当作木偶玩耍，狞笑着。真是凶残到了极点。望城坡染坊有个青年名叫杨和生，被日军掳夫也到了冯家大屋。他正准备逃走，却被日军发觉。日军把他捆在大树上，灌进汽油。几天后，一身肿得箩筐大，尸体放不进棺材，就用一口大水缸掩埋了。

外地一个妇女路过冯家大屋，日军强迫奸淫，她拚命挣扎。日军就将她奶子割掉，乱刀刺死，丢到吴四塘水里，尸体腐烂，发臭生蛆，无人收殓。

4月25日，天还未亮，日军大队人马外出打闹。当时群众误以为他们走远，一时放松警惕，多从屋前经过。当张明亮、蒋锡忠等农民路过这里时，正碰上日军大队返回，不幸全被抓住，日军用两根箩索把他们的手串吊起来。张明亮被吊在尾端，扭松逃出，躲进猪栏下的粪池里，用马桶罩在头

部上，幸未发觉，后寻机脱离了虎口。当日下午四时许，日军发现一人逃跑，就将蒋锡忠等十一人用一根绳索系着，牵到冯家大屋左侧的山坡内，全部用机枪杀了。

日军马队在冯家大屋仅驻了三天，割青苗、杀牲畜、烧毁家具不计其数，粮食糟蹋得一干二净。群众愤恨地说："吃活猪，烧花床，满垅青苗都割光。粮食撒满地，棉被垫马栏。强奸妇女，杀害农民，小孩当作木偶玩。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王。"（本文作者系国营东方红农场退休干部）

## 三治龙王港

西郊龙王港，发源于宁乡、望城县交界处的云盖。上游汇白箬铺、谷山之水，经梅溪滩，再沿狮子山南麓，绕过岳麓后山的咸嘉湖，盘旋曲折，从溁银桥注入湘江，全长约20公里。

千百年来，一遇山洪暴发，这条奔荡不羁的洪水泛滥成灾，淹没禾苗，冲走房屋，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自古流传着一首民谣："韩家湖上水汪汪，十年湖田九年荒。龙王年年吐黑水，穷人岁岁遭祸殃。"不少善男信女，当时只好立龙王庙，修龙王桥，祈祷龙王爷救苦救难，赐保平安，由是得名龙王港。但悲惨岁月，世代相承，求神庇佑毫无效果。于是，后人便采用降伏的办法，征收近万斤生铁，铸造三条凶神恶煞的铁蜈蚣，嵌在龙王桥的三跨桥拱上。不久，又流传一首民谣："岳麓山上自来钟，龙王桥上铁蜈蚣；龙王要从桥上过，蜈蚣铁钳锁蛟龙。"可是，铁蜈蚣毕竟没有锁住洪水，龙王庙和龙王桥



一起被冲毁了。桥拱上的铁蜈蚣，成了行人们玩赏的古迹。

传说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游幸江南从此经过，正遇上当时的湖主征集民伕挑土筑堤，取名"圣堤"；还重修了龙王桥，在新铺的每块麻石上刻上"正"字，想借皇帝的年号来镇住龙王。结果，皇帝也无能为力。民间又流传着一曲悲歌："龙王港里出孽龙，不怕皇帝铁蚣蜈；龙王飞起桥上过，日月不明草不生。"

1959年，当地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千人上阵，进行围湖加固，并将韩家湖雅化为咸嘉湖。

1965年冬，我郊组织万人劳动大军顶风冒雪，治湖改水，将弯弯曲曲的龙王港的下游三千四百多米，五十三万多土方，由南改北。拆掉龙王庙，搬开铁蜈蚣和"正"字石，将溁银桥至磨桥一段三千多米的老龙王港废掉，沿扇子山下开凿一条新港，兴建了岳麓桥、溁银桥和一架便桥、涵闸，装上了排渍机台。

1974年冬，我郊又组织万人劳动大军，将龙王港的上游望麓桥至磨桥一段九百米，土方三十多万方，由南改北，修建渔湖二千多亩。从此这个十湖两洲的水乡，根除了千年水患，经受了1982年历史最高水位38.37的洪水考验。现在龙王港、咸嘉湖已成为鱼肥菜茂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后来人民都唱赞歌："不信蜈蚣不信神，人民力量锁蛟龙。自从三次治港后，年年鱼足菜粮丰。"

（摘自《长沙市郊区地名录》、编者有增改）

## 长沙郊区部分地名掌故

**洋油池**　洋油池位于北郊国营综合农场境内。1901年9月，俄、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美帝国主义打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等幌子，为捞取更多的利益，在中国办学校、传教、开辟商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清光绪末年（1908年），美国“美孚煤油有限股份公司”在此处建煤油池，进行经济掠夺，后遂取名洋油池。当时，该池出产的“美孚洋油”远销至岳阳、衡阳、邵阳以及江西省安源、莲花、万载等地区。建国后，帝国主义分子被驱逐出境，洋油池已彻底平毁，原地变成了富庶的农场。

**金盆岭**　金盆岭位于南郊金盆村南部。据《善化县志》载：“县南七里，山势盘曲如盆，古战场城南可营守。”岭上有金盆寺，寺前有一深潭。水碧晶莹，终年不涸，如金盆托底，金盆岭由此得名。

**白田铺**　白田铺位于南郊洞井乡白田村，距市内十五公里。该铺座落于群山环抱之中，近处有水田三千余亩。一溪斗折蛇行，每逢雨季渍水满垅，田成泽国，故名白田。明末在此设铺，故名白田铺。

**圭塘**　圭塘，古名龟塘，位于南郊洞井乡北部。据《善化县志》载：“圭塘县东十五里，原名龟塘。府志晋时，长沙县东有神龟，皎然白色，形长五尺，出游上岸，因名龟塘。广延十余里，明知县唐源修筑，年久茀废。清康熙年间，生员王自拔呈请废塘作田，经知县贾汝翼清丈承粮，册名圭字区。”遂名圭塘。

**洞井铺**　洞井铺为南郊一小集镇，距市内十公里。古时十里一铺，设卒传递公文。沿古驿道，上有白田铺，下有石马铺，洞井铺则居其中，铺址地势平坦。有一流泉，人们因泉掘井，洞井铺故以此名。

**黑石铺**　黑石铺位于南郊大托乡北部，距市中心十公里。据《善化县志》载：“此处古有黑石潭，岸有奇石耸峙。”因年代久远，潭已淤塞。明朝末年，张献忠统率义军入湘，明官府下令于该处设铺，黑石铺因此得名。

**洪山庙**　洪山庙位于浏阳河下游北岸，今国营综合农场洪西管区西南部。往昔每当山洪暴发，浏阳河水从南向北奔腾呼啸滚滚而下，被山所阻。水石搏击，轰然巨响，声若洪钟。浪高数米，泛滥成灾，此山却巍然屹立于洪峰之畔。相传清同治年间，周姓在此建庙，供奉洪山王爷，故称此庙为洪山庙。1958年，此庙被毁。

**捞刀河**　据《清代地舆图》载述：该河名涝塘河。俗传三国时蜀将关羽取长沙时，在落刀咀刀落入水，至涝塘河捞起宝刀，因而亦名捞刀河。

（根据《长沙市郊区地名录》摘编）

# 编 后

《长沙郊区文史》创刊了。为了让广大的文史作者和读者对我郊历史区划情况在思想上有个大体的轮廓，首辑特发表了《长沙郊区区划概况》一文，提供大家写史和阅读时参考。

我郊是长沙市蔬菜、牲猪、柑桔，鲜鱼、西瓜等副食品生产基地，又是湘粉生产的一个重点区。这一期《经济史料》栏目里，先就湘粉、柑桔生产的有关史料作个介绍。今后，将继续征集、刊登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以说明我郊经济的地方特点。

这一期共编《政治风云》、《文卫史话》、《乡土风情》、《英烈传略》等五个栏目，今后，还将根据史料的征集情况，新辟其他栏目。

本期刊用的《做好军粮工作、策应和平起义》、《湖南抗敌画会在郊区的宣传活动》和《撤出"音专"迎接解放》三篇史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回忆录；还有《湖南儿童专科医院始末》、《父亲在识字岭英勇就义》和《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的几位作者，非常熟悉所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是很强的。

本期刊用的关于我区湘粉、柑桔生产，出土文物和烈士传略等史料，作者都是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并经过多方调查研究而编写的。因此，这些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期的作者：陈国钊、张若曦、刘敬业、雷键敏等同志已离休、退休，他们人休心不休，为编史发挥余热。罗立德、柳轻飏两同志正著书交稿紧张阶段；还有朱明超、丁琦、杨桦、僮俊杰等同志公务很忙。他们都挤出时间撰文赐稿，在此谨表诚恳的谢意。

我郊政协成立时间不长，文史工作还处于初创时期。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人手单薄，疏陋之处，实所难免。敬望广大读者惠予批评指正。

**编 者**

1984、12、1、

## 《长沙郊区文史》稿约

一、来稿范围：

1、时限自戊戌变法起至“文化大革命”前止。

2、内容包括近、现代各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医务、卫生、科技、工商、民族、侨务、宗教和社会生活以及敌、我、友各方面的人物、事件等。

3、有关近、现代史著名人物的遗物如日记、遗稿、手迹、书信、函电等，亦所欢迎。

二、稿件要求：

1、以撰写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和所熟悉的历史人物为主，并尽可能地反映我郊的地方特点。

2、来稿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秉笔直书。不溢美、不贬损，实事求是，坚持真实性。内容力求具体，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反对臆造、剽取和抄袭。

3、文字通顺，书写清楚，形式不拘，但一般不刊登文艺性作品。

4、作者注明真实姓名和详细通讯地址，以便联系。

三、来稿处理：

1、来稿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2、稿件虽未刊用，但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可根据其价值大小，酌情付酬。

3、不用稿件一律寄还。

**长沙市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年12月

封面设计　朱赞时
封面题字　萧金铃

长沙郊区文史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责任编辑　李炎坤
长沙市文华印刷厂印刷